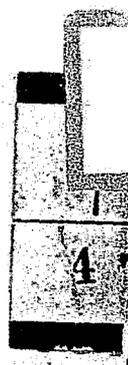


三民主義者  
之使命

漢民

上海民智書局



#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目次

三民主義之認識

國民革命進行中的責任

三民主義與世界革命

革命的努力與方向之認識

怎樣纔能繼承總理之志業

要磨鍊我們革命的力量

青年的煩悶與其出路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

不要上C P的當

不要讓C P搗亂國民革命

目次



3 1799 6077 2

116  
D693.053  
30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

C P 的手段和政策

重要的兩個批評

附錄 鮑羅庭究竟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能力？

## 三民主義之認識

### 一、三民主義是以博大的無所不包的世界進化定律爲總樞紐的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是從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先生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看出兩個要點：（一）世界歷史是依進化的定律而演進的，進化又是以爭生存爲中心的；（二）由爭生存這個中心，分演出各種的進化現象和事實，由進化的定律，分演出民族同民族爭，國同國爭，國內人民同君主爭，勞動家同資本家爭的種種現象和事實。這兩個要點，站在進化定律的立場看，是一貫的。這是先生的歷史觀。所以依先生所說：人類在世界進化中爭生存，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人同人爭，一定要到大同，才能解決。

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所發生的爭多得很。舉其最著者，如君權與神權之爭，君主與貴族之爭，君主與人民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殖民地與帝國主義之爭，國與國之爭，民族與民族

之爭。這許多鬥爭，並不是在全部歷史上分了顯明的階段的。許多著名的史家，因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把這種種鬥爭，分做由神權與君權之爭，到君權與民權之爭，再到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的階段。這是不甚正確的，易引起誤解的。孫先生的學力之偉大處，就在於能把這種淺狹的時間和空間的界限看破，而一口道出各種鬥爭的聯屬性，總括的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君權與神權之爭不過是佔一極小的部分，推而至於民權而君權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也都不過是各佔一部分。只拿一種鬥爭去解釋歷史，不但不足以盡人同人爭的全部，而且會走到和世界進化相反的末路上去。簡單的說，各種鬥爭，在歷史上有時是各別的發生，有時是混同的發生，有時是間斷的發生，有時是片段的發生，這都是由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所決定。但是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還不過是各種各別的鬥爭的枝節因緣，而非全部人同人爭的總因緣。人同人爭的總因緣，就是以爭生存為中心的進化定律。

孫先生將歷史上各種各別的鬥爭，歸納為三種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這三種革命，可以包括所有的歷史事實，故亦可以括盡人同人爭的內容。而且，在歷史上，三種革命也沒有什麼

顯明的階段可分。我們只要取十七世紀以來的世界史一看，就發證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是常常同時並起的。但是世界的學者，都是就一種革命的要求而發爲革命的思想，如盧梭天賦人權之說，專重民權運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專重無產階級運動，可爲明證。孫先生獨能超越於任何一種革命之上，而創立一個嶄新博大的三民主義，這是先生最偉大的所在。先生看到人同人爭的歷史的行程，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由比較的各別發動而趨於混同發動，由比較的和緩演進而趨於急激展開，由比較的涉及於少數人而趨於涉及於大多數人。所以先生創造三民主義，就是應合這種歷史的行程，而成爲一個整個的革命主義。世界上無論那一派的革命主義，在理論上固沒有那個能如三民主義的完備，在實行上更沒有那個能夠跳出三民主義的範圍，這就可見三民主義之博大了。

結論：爭生存是進化的中心；進化是世界歷史的中心；三民主義是以世界歷史的中心爲綱領，其範圍則爲過去現在未來人同人爭的革命運動所莫能外。

## 一、二民主義的連環關係

現在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同時急進化的時代，其原因就是全世界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充滿了世界歷史。從前各國有解決了民族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權民生問題；有解決了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縱有解決了民族問題或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也是落空。就時間上說，自古以來的世界，是這三大問題遞嬗堆積下來至今還未解決的懸案，尤其是到了現在必須一同解決的懸案。

就這三大問題亙古久懸不決一點上看，這就是需要世界革命的世界；就世界革命所要求解決的三大問題看，這就是三民主義的世界；更就三大問題成爲整個的連環的懸案看，現在就是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最需要的時代。在這個時候，世界革命的統一性與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必須保持首尾相顧之關係。換言之，各部革命要保持世界革命的統一性，但同時不要失却各部革命的特殊性；反之，世界革命要保持各部革命的特殊性，但同時不要失却世界革命的統一性。這個條件是世界革

命成功的大關鍵。

能夠適合於這個條件，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相互關係，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以這一個大連環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滿足世界革命的統一要求，以三個小環的實行性去應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是最適用的，最切合的。

三民主義爲什麼最適合於世界革命，還可進一層從三民主義連環關係的本身認識出來。(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權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爲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主主義的民權主義，才不會變爲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要三民主義連環的實現，人同人的鬥爭才能終熄，大同世界就可實現。

結論：世界各國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有同時解決的需要，是爲世界革命的目標；三民主義因其連環的內容和關係，爲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適合的原則。

### 三、以三民主義批評其他主義

三民主義的整個性和連環性，既如上述，我們就可站在它的連環性上面，來簡單的批評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弱點了。

(一) 國家主義，沒有世界革命的資格，自不必說。固然，在求國家之自由獨立一個目的上，它也是要抵抗強權，因此它就可以牽合到民族主義的底下，但它却不是民族主義全體，尤其不是整個的和連環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全體，而事實上發展到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那種國家主義，就成了帝國主義的代表。所以國家主義，一行到國際上頭去，就發生毛病，即近代談國際主義者也要反對。何況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其最終目的是做到世界主義的，還能夠不反對它麼？於此我們就可以說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至於在走偏到帝國主義一條路上去的一點上，國家主義簡直要變成民族主義的敵人了。

(二) 無政府主義的最終目的為無治，為大同，與三民主義目的完全一樣；但其最大的弱點，在於

沒有實現大同的方法，它有世界革命的願望，却無世界革命的方法與行動。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比無政府主義更博大，與無政府主義有同一之目的，而其方法則為無政府主義之所無。因為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由權與能之分開，由打破強權就可達到平權，由平權就可達到無權，無權就是無治。再加上三民主義之連環的實現，民族由平等而至無爭，民生由平等而至無階級無貧富，這豈不是世界歸於大同了麼？到了這一步，文化一定極優美，道德一定極高尚。所以我們可以說，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纔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二)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這幾年被俄國和第三國際採用得來，倡世界革命，便成了流行一時的舊骨董。但以馬克思主義為世界革命的基本理論，其最大弱點有二：第一是不新；第二是不毅。不新不毅，所以就沒有成績。何以不新呢？馬克思的主義，是就七十年前的歐洲經濟現象所下的結論，不是就世界進化現象全部所下的結論，所以不是新的，而且是不適用的。何以不毅呢？馬克思處處不肯失去其科學方法，這是他的好處，但正因其不肯失去科學方法，就證明其為不毅。因為他的科學方法，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所研究的對象，只是經濟生活演進的一段，這是時間的限制，研究的範圍，只是

歐洲一二國的經濟材料，這是空間的限制。馬克思充其量不過是世界革命的學者之一，他的主義那能比得上包羅全部歷史事實和應合世界進化定律的三民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不毅的第一證明。馬克思的第二國際之秘奧，全在拿階級鬥爭的縱的結合，去衝破民族鬥爭的橫的結合，所以他的口號是『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歐戰時，第二國際更倡『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但第二國際統轄下的各國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大多數都爲贊助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失節，第二國際即因以瓦解。這可證馬克思一派人不曉民族主義的失敗。俄國革命，祖述馬克思，但是同時列寧就於馬克思『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加了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列寧的本意，在以階級的革命爲主，而利用東方民族革命爲輔。這是列寧比馬克思懂民族主義的地方，而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和第三國際之所以能夠維持到今天，還是爲此。列寧在階級鬥爭之外，加用一點民族主義，本來已是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一派人却辯護說，這不過是利用民族主義。但是我們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義，正足證明他們非承認民族主義的事實不可。由馬克思和列寧兩派的經驗，便得兩個教訓：第一，歐洲階級革命便不行；第二，東方民族革命才行。但是俄國現在的列寧主義者還沒有

覺悟，還沒有領悟這個教訓。因為第三國際還想借帝國主義的本身和對象以統治東方各民族革命。這正足證明其還沒有認識民族性之全部重要意義。總括的說，馬克思是不懂民族主義，致有第二國際之失敗；列寧懂了一點，遂收了多少革命的成效；現在第三國際由不懂民族主義而至於傷害東方民族的性，其錯誤必與馬克思同，其不足為世界革命的基礎亦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毅的第二證明。最後，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是不願要民權主義的，因為它所要的是無產階級獨裁。民權主義的本意是自由平等；在世界革命的立場看，是沒有絲毫惡意的。但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者，一定要把古代希臘的民主和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拿來做攻擊民權主義的材料，並且以此就來襯出獨裁是真的，民主是虛偽的。這一點我們姑且退一步承認，但是馬克思派又不肯老實說獨裁是真的，還要拿『民主集權』以階級獨裁消滅階級』一類的話來做掩飾，這豈不是承認民權主義是政治的極則麼？再就他們解釋階級獨裁的內容而論，說老實話，就是求一個階級的民主，而壓迫其他民主，還不是承認了民權主義麼？馬克思派一方面攻擊民權主義為虛偽，一方面又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是一個大矛盾點；一方面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一方面又只接受民權主義的一小部分，是一個大弱點。但是在

世界革命的需要上，不接受民權主義的全部，便不足以領導世界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不設的第三個證明。由此三個證明，我們更下一個總結，就是：共產主義在基本理論上不懂民族主義和不要民權主義，是犯了不設做世界革命基礎的幼稚病；在實際活動上却只接受了一點點民族主義和一點點民權主義，故其結果，最多不過做到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哪能配談世界革命？既幼稚而又不徹底，便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都不行。何況馬克思爲共產主義定下的結論，是七十年前就一時一隅的經濟現象所定的，已是陳腐不適用，怎能用以實現世界革命的目的呢？孫先生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這句話正因先生看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全然不行，只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才能實現共產主義所指向的目的。不懂三民主義且不懂共產主義的人，把先生這句話當做共產主義的護身符，實屬大錯。要曉得凡是講世界革命的人，最終目的，一定是相同的，但是方法不同，就關係重大了。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得通的，誰就是真正世界革命者；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不通的，誰就是不革命者，甚且誰就是反革命者，所以孫先生『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一語，實不啻把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打到不革命和反革命的

路上去了，而一般人還想拿先生此語作護符，這真是自暴其不革命和反革命的醜態！

結論：國家主義，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上為不健全，其病在幼稚；在事實上發展成爲帝國主義，其病在偏爲民族主義之下的右派。無政府主義，在企望人人自由平等人人無權無爭的理想上爲民族主義的左派，而其病在於無實行的方法。共產主義，在階級革命和階級獨裁的理論與方法上，其病在幼稚；在不認識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於世界革命爲需要的全部意義上，其病在不澈底，強暴行之，且有自趨於反革命一途的危險傾向。

#### 四、總結論

從以上簡括的說明，我們更作一個總結論，就是：人類以爭生存爲中心，而爭生存就是世界進化的中心。從世界進化的行程，自古以來就生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革命者的唯一任務，即在於了解此三大問題之所從出，依其需要解決的企望，和客觀的實際所備具的條件，定出一完備的革命主義，以求全部澈底的解決。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即本此義而創立，故其博大悠久的適用性，古今中外

實無倫比。馬克思主義固不失爲一種富有革命性的學說，然受時間和空間的制限，未能了解歷史的眞正重心，遂失其領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能糾正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的觀念之錯誤的，最近固有一派，如美國學者威廉氏，卽其一人，但其短處在昧於世界革命的急切需要，而不知世界進化實有日向激急的革命化之趨勢，故其學說不能逃缺乏革命性的批評。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則兼具兩派學說之長，而無其短。這就可知先生眼力之偉大，學力之偉大，魄力之偉大，革命性之偉大。許多人以為現在只管國民革命，等到國民革命的結果，大家已死在地下，共產主義也好，三民主義也好，橫豈管不到的，何不等後來人去爭個解決？說這種話的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懂得爲什麼有革命的需要，沒有懂得革命爲什麼要主義，更沒有懂得我們的世界是什麼世界，所以他就根本上把國民革命看做一回事，世界革命另看做一回事，這哪裏是忠實的革命者？哪裏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哪裏是孫總理的信徒？我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都應該了解總理的歷史觀和進化觀，都應該了解總理的主義之出發點和開展線，然後纔能了解國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一致，纔能了解各部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必須爲三民主義的革命。凡我同志，當急起注意。

## 國民革命進行中的責任

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慶祝大會演講詞

國民政府唯一的任務是服從黨義完成國民革命——對內肅清一次叛徒對外多得一次勝利——中國國民黨的民衆比世界各國都多——提高黨權是提高真正國民黨的黨權——國民革命爲的全民衆不是爲的少數人或某階級

國民政府的唯一任務，是要服從中國國民黨的指導，完成 總理所倡導的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是 總理手創的，決不容許人家來破壞。三民主義是 總理手創的，決不容許人家來曲解。我們要在 總理的中國國民黨之下，要在 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下，來完成國民革命，才是完成 總理的遺志。現在社會上還沒有了解國民黨的真象，還沒有了解國民黨的主義和革命政策。其實國民黨的革命政策，都是在 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下所產生的，不是 總理的三民主義所產生的政策，便是反革命的政策，不是以三民主義爲根據的黨，便不是國民黨。如果離開了三民主義來講 總理的遺志，如

果把 總理所沒有講過的，算爲 總理的政策，那便是 總理的叛徒。這一個標準，是必須要先立定下來，纔能識別那一個是 總理的信徒，那一個是 總理的叛賊。

現在我們國民黨的革命進行，是比從前任何一個時期都要進步得多，但是同時內部也發現了一種反革命和假革命的叛徒。譬如民國十年，北方軍閥勾結了帝國主義，壓迫西南，總理率兵北伐，師次桂林，遂發現陳炯明搗亂後方的陰謀。後來改道江西，卒以陳炯明公然叛逆，北伐之師，遂受頓挫。民國十四年，曹錕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助，指使陳炯明的餘孽和一般新附的假革命軍隊，從四面攻打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廣州，而不久革命政府的內部，又現發楊希閔劉震寰等一般叛徒。那時兄弟負責，把楊劉勦滅。現在蔣介石同志平定東南，我們國民黨的陣地以內，又發現跨黨份子破壞國民革命的逆跡了。所以革命勢力每有一次的發展，內部便須肅清一次的叛逆。內部叛逆每經一次的肅清，國民黨的革命實力，對外面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類反革命的敵人進攻，便多得一次的勝利。

現在跨黨份子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完全是用偷偷摸摸的狗偷鼠竊手段，比以前陳炯明

楊希閔劉震寰等的公然對於革命，實行叛逆，還要可惡。因為他們公然反叛，一般民衆認得出是和革命分離，而跑到反革命一條路上去的，他們的罪惡，一般民衆容易看得清是和革命不相涉的。至於跨進國民黨的共產黨份子，假定革命的名義，做了狗偷鼠竊的勾當，還要將國民黨來掩護他們的罪惡，使一般民衆認不清國民革命的真實意義，這簡直是污辱革命，污辱革命就是反革命。他們名爲擁護總理遺囑，暗裏却事事違反。總理遺囑，他們名爲擁護。總理的革命政策，實則變更。總理的革命政策內容，甚至暗裏擱置。總理的政策，而宣傳共產黨所持以爲假面具的政策。至於 總理的主義，更不必說，是他們相約起來不要了解的。回想民國十三年，總理容許他們個人加入本黨的時候，他們自己說信仰三民主義，到了現在，他們連了解都不要了解，那還有什麼信仰。

我們從各方面所得的事實觀察下來，知道共產黨是專講策略而不問主義的。他們不要民衆了解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並且也不要民衆了解他們的策略。我們革命是爲民衆謀利益的，國民黨要解放全國被壓迫的民衆，更進而要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民衆。國民黨是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更進而至於人類的自由平等。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必須要民衆自己了解我們革命的主義和政策，要民

衆自己來實施我們的主義和政策，然後革命所得的利益，民衆自己纔能真實享受。中國共產黨都正與此相反，他們不深研究主義，只要策略。策略的作用，只要他們內幕裏幾個人知道就算了，其餘的民衆，只應該做他們的工具，只應該做應聲蟲。他們在外面都說，『國民黨沒有民衆。』我說，『做幾個少數策略者的工具和應聲蟲，這樣的民衆，國民黨確是沒有。但是明瞭三民主義，願為效死的民衆，無論世界各國的政黨，都沒有中國國民黨的多。』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是為人的，所以我們的黨，是犧牲自己，來為民衆，共產黨却是犧牲民衆，來為自己。犧牲民衆為自己，就不是革命的目的，就是反革命。中國共產黨最高的限度，和最低的限度，都只能負得起一個犧牲民衆而為自己的責任。至於要救中國，要救世界，只有我們——總理的中國國民黨，才能担負這個重大責任。

中國共產黨犧牲人家為自己，這一種手段，首先施之於我們——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他們對付本黨的策略多得很，我們只要舉出幾種做證明就夠了。他們頭一個策略就是憑空造出「左派」「右派」「新左派」「新右派」一類的口號，加到國民黨同志的頭上。一般人平日也不知什麼是「左派」「右派」，聽了人家怎麼呼，他們也就怎麼傳。傳呼了幾陣，便把國民黨整個的黨，分拆成幾

個互相懷疑的派別。無論什麼右派，左派，乃至新什麼派，都上了當，尤其是整個的國民黨上了大當。因為整個的黨，中了共產黨風處種中的毒計，便給他拆散了。共產黨人爲什麼要拆散國民黨呢？因爲他們把國民黨拆散之後，他們便好放一班共產分子到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去握取黨權。握了黨權，他們便好再施行第二步的策略，於是排斥我們的青年同志，我們的同志要介紹青年入黨，也多方挑剔，多方留難。我們的同志要做農工運動的，也到處受壓迫。如果誰敢批評他們的，他們便拿出預定的口號出來，說你是「右派，反革命。」他們把中國國民黨的基本忠實黨員排而擠之，到了相當的時候，便又進行他們的第三步策略了，就是挑撥我們的領袖，離間我們有革命歷史的同志。他們這種策略，目的在於傾覆國民黨的權力機關。這種策略，正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歷年所求而不得的。他們既然施用種種的策略來破壞國民黨，當然就無異做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工具了。可是共產黨儘可拆散國民黨黨員的個人，却不能拆散國民黨黨員護黨的精神。共產黨儘可截斷國民黨與民衆接觸的路，却不能強迫民衆抹煞國民黨過去革命的歷史，和現在革命的成就。共產黨儘可侵蝕國民黨的中樞，却不能一網打盡我們。總理的信徒，我們在共產黨今日放散「提高黨權」一個口號來壓迫我們的

軍事領袖的空氣之下，我們還保得國民政府無恙，國民革命軍無恙。因此，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就要一致受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的指揮，真正的做到提高黨權。我們要提高黨權，是要提高中國國民黨的黨權，不是要提高在中國國民黨之外的一個黨權。

最後，總括的說，革命的要義，是要在破壞之後能夠建設，只能破壞而不能建設，便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要為民衆而後去革命，不是為革命而後去找民衆。更不是要為少數人或是某個階級去革命。我們國民革命是為民衆而革命，是為全國各階級的民衆而革命。我們要解放全中國的被壓迫民衆，所以必須先完成國民革命。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我們必須擁護今日建都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必須擁護這指導國民政府的中國國民黨。

## 三民主義與世界革命

歡迎宮崎龍介演講

剛才宮崎先生指教我們，要放大眼光，要有世界革命的精神，這是不錯的。不過我現在敢造次的再就宮崎先生的意思，補充兩點。第一點，宮崎先生說，照論理學上的公式看來，馬克斯學說是大前提，俄國實行馬克斯學說是小前提，大前提雖不錯，但是小前提的事實已經失敗，已經錯了。那末，所得的結論，也必定錯了。據我看來，這個小前提固然是錯的，就是那個大前提又何嘗不錯呢。大小前提通通錯了，結論的錯，更不待言了。我們現在先想想看，究竟甚麼是世界革命。有人疑惑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絕非一事，那末，一定要說中國在世界以外，中國以外的革命才是世界革命嗎。若說以一個主義，打破國界，貫徹了全世界去革命，才是世界革命，那末，革命總該是應合世界民衆需要的，不合民衆的需要，便非革命，難道所謂一個主義，是一個硬化的公式，不問各國民衆需要不需要，不得貫徹也硬用他來貫徹，這樣便算得是世界革命嗎。馬克斯主義是學說，不是聖經。他創這種學說的目的，雖想做一般

革命行動的指針，而他和恩格斯常承認自己的錯誤，他的主義，非經濟十二分發展的國家，談不到實行。他所謂新社會的條件不在舊社會裏孕育成熟便產生不來，經濟十分發展以後，確到成熟的當兒，才能來用他的辦法。他的辦法，只能相當於穩婆接生的方法。如果兒胎尚未成熟，母體自己尚未發生變化，便勉強施手術，不顧兒胎和母體的生存，連馬克斯自己也不主張這樣辦法。可見馬克斯主義，對於世界上經濟落後的國家，老實不客氣，是沒辦法的，如何能用他這個主義，去完成世界革命呢？馬克斯是用科學方法形成他的學說的，他所搜集採用的材料，僅限於歐西諸國。美洲的材料，且未嘗用，何況亞洲的呢。從他所用的材料範圍之中，所得的結論，當然是有局限的了。所以馬克斯主義，頂多祇可適用於歐洲革命，那里能適用到世界革命上去呢。就連歐洲革命，適用他的主義，歷史告訴我們，已經失敗了。只要看第二國際中的人，個個都是馬克斯的高徒。他們說，大家要為階級鬥爭，不要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他們的決議極堅決，但是大家回國以後，想提倡將外戰改作內爭的，仍舊外戰，提倡將國際鬥爭改作階級鬥爭的，仍舊去國際鬥爭。甲國馬克斯主義的信徒去打乙國馬克斯主義的信徒，甲族的無產階級去打乙族的無產階級。國家觀念和民族思想，究竟打不破階級的觀念，反而被他的濃

厚空氣壓下去。這是第二國際一般馬克斯信徒分裂失敗的情形。我們對於那些資本帝國主義者利用國界種界，來造成歐洲大戰的罪惡，並不願爲之末滅，而馬克斯主義者祇空唱工人無祖國，一相情願地，和生吞活剝地去幹，弄到手足無所措。這不止是他們領袖個人失節不守節的問題，而是馬克斯主義不能領導世界革命的問題。後來第三國際比較狡猾一點，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一個口號之外，添上「世界被壓迫民族起來」的口號。姑無論第三國際的真相如何，祇就這一點而論，已是要修正了馬克斯主義。已是證明，專倡階級革命的馬克斯主義不能領導世界革命了。馬克斯主義既不能領導世界革命，甚麼主義能夠領導呢。當然是三民主義了。三民主義無所不包，世界自有革命史以來，沒有一次革命的意義，三民主義不能包括的。就是將來世界上任何真正革命的事實，三民主義一定也無不爲其主宰的。民族主義做了三民主義的先鋒，同時又和民權民生兩主義，互相紐結連鎖，而形成一個整個的主義，永遠足夠應付世界上各民衆的需要。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世界各國所採用的斷片的民族主義，迥然不同。斷片的民族主義，進一步就是國家主義，再進一步就是軍國主義，接着便變成帝國主義了。譬如日本維新的時候，未嘗不是用的民族主義，何以不久會變成帝國主義。

的呢。便因為當初沒有認識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了。德意志、意大利等國，在已往的歷史上，無不如此。也不單日本一國爲然呢。於此可見已往的世界革命，動因雖都包含在三民主義的範圍之中，而方法實在並未曾用過整個的三民主義，所以世界至今仍然紛擾不堪，而有待於革命。總之，三民主義是以獨立自由平等爲發起點，仍以獨立自由平等爲歸宿點。共產主義不過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才是共產主義的實行。無治主義便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才是無治主義的實行。世界主義便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才是世界主義的實行。試問世界上各種主義的實行，有出乎三民主義之外的麼。除掉了我們的三民主義，還有那一種主義，是真能領導世界革命成功的呢。

以上說惟有三民主義能領導世界革命，馬克斯主義製造階級，抹殺民族，根本便錯，斷不能領導世界革命，是補充宮崎先生意思的第一點。第二點呢，乃和宮崎先生兄弟的意思，不敢雷同的地方。宮崎先生的兄弟曾說，『勞農黨是最革命的，』這句話錯了。世界上最革命的是我們，是我們三民主義的信徒，絕非勞農黨。從來世人對於馬克斯學說，只有過分的信仰或過分的攻擊，而沒有公允的批評。無形之中，便造成一種勞農黨最利害的謬見了。我們對於馬氏學說，只有相當的承認，否則馬克斯學

說便變成宗教，不是科學了，便不是馬克斯主義了。馬氏學說的成功全在用的科學方法，是很對的。但是空間和時間，一齊限制了他，所以他的結論，有許多錯誤，這也是用科學方法所難逃免的。所以他的學說，雖有錯誤，仍不失其相當的偉大。至於他的學說的刺激性，煽動性，好像是最利害，和他對壘的學說，好像都不行，趕不上他。其實天下事，凡是在相當時期之中，能於實現的，才算得是利害。若是歷史上既往的陳迹，或是未來的空遠的理想，有什麼利害呢？如果馬克斯共產的學說算利害，我國老莊虛無的學說，應該更利害了。革命是應合民衆需要的事，民衆的需要是不能蔑視的。甚麼是民衆的需要，要憑客觀事實去定，不是一個人的主觀可以武斷亂定的。宮崎先生說：『共產黨想以一種空想造成公式一成不變，削足就履最笨不過了。』這句話很對。不合事實，不能實現，就是個不行。馬氏立說在幾十年以前，目前世界的情勢，久已變了，以後的情勢，更非馬氏所及推測，就是個不新。既不新，又不行，還利害些什麼？我們自己站在最革命的立場上，腳踏實地的向前去做，處處應合世界的需要，處處能實現，便最利害不過了，還有什麼比我們更利害的呢？我們總理曾說過：『三民主義已經實行於俄國，可惜我們許多的同志不留意。』俄國的確早已有人認識三民主義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推翻了

皇族的壓迫，扶助起許多弱小的民族，民族革命大成功。當時他們嘴上說的是奉行馬克斯主義，因為馬克斯氏不講德謨克拉西，他們便一面不要德謨克拉西，一面又要求將來的德謨克拉西，可見他們實在還是不能否認民權主義的。他們對於我們的三民主義，實在在那裏巧偷豪奪的應用。他們表面上不承認，是另外一回事，事實的確是如此的。可惜他們對於三民主義，雖巧偷豪奪的應用，但是未曾完全認識，完全接受，同時又生吞活剝的鬧階級鬥爭，終久變成惡化。所以他們的革命，一方面有許多成功，一方面又有許多失敗。

至於東方C P用的是列寧主義，早不是馬克斯主義了。而且他們向來把主義放在後面，把政策放在前面。他們的政策是搗亂。搗了許多的亂以後，回過頭來，看看主義，也已經亂的不像樣子了。甚麼主義都有，甚麼主義都沒有了。所以他們所說的主義，連他們自己也不奉行。也攪不清，簡直不相干。我們何必還一味盲從，對人亂加恭維，對己妄自菲薄呢。前幾天有一位武裝同志，就要作戰去，對我說了兩句話，非常的透關。他雖不是學者，這兩句話，一般學者却說不出。他說，凡事都由必要生可能。譬如一個人，吃飯是必要的，然後口舌學了能吃飯，行路是必要的，然後腿腳練了能走路。惟有現在共產黨所主

持的搗亂行爲，是由可能生必要。他們無惡不作，善於作惡，作惡是他們的可能，他們已經作了許多惡了，然後便想出許多道理來，說這是大家所必要的。政策放在主義前面，主義放在政策後面，便弄成這樣大的笑話。

如上文所說，第二國際是馬氏學說的正統派，何以會失敗的呢？正因為誤認階級可以打破民族，一時便想打破民族觀念的緣故。第三國際較爲聰明點了，偷了我們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去，把第二國際的主張修正一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一個口號以外，又加上一個『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但是他們仍以民族主義爲民主主義的工具，並無誠意去實行民族主義。他們想以俄國一國爲主，對世界國際施行專制獨裁，大大的違反了民族自決的原則。所以他們的主張，在匈牙利、波蘭、德意志、意大利等國，通通失敗了。到了現在，在東方的陰謀，又大破露，大失敗了。眼看着第三國際就要瓦解了。這本窮源，就是爲的不懂三民主義的原故。

我們相信，將來祇有三民主義，祇有三民主義的「國際」可以解決世界種族上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問題，實現世界革命的成功，由推動東方社會，進而至於推動全世界。（後略）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

二六

## 革命的努力與方向之認識

六月二十六日在金陵大學

跟了c p跑就是走錯方向——打倒c p勿錯到帝國主義和軍閥打倒c p的方向去——打倒c p勿錯到c p的奪取政權佔領機關的方向去——革命努力的方向是「中」——「中」是適者生存的「適中」不是調和妥協的「折中」

今天我到會演講，是遲到了，爲什麼遲到呢？因爲錯了方向，多走了許多冤枉路，所以遲到了，爲什麼走冤枉路呢？因爲腦子裏的幻想錯誤，把走錯的方向，當作對的方向走，所以走了冤枉路了。

同志們，青年同志們，站在革命前線的同志們，總理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很鄭重的叮囑我們說，「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努力」二字，極爲重要。絕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了解的。現在革命還沒有成功，所以要努力，尤其是青年同志們要努力。但是譬如汽車雖快，有時乘汽車也會走錯方向，那就不快了。在革命路上，也是同樣會走錯方向的。革命路上走錯方向，關係的重大，比起乘汽

車的走錯方向，不知要加上幾萬萬倍了。我們總理的主義，和一切政治上的主張，都沒有走錯方向，更不會有什麼錯誤。但是自從c加入本黨以後，我們的同志，有的早些，有的遲些，都看出他們是走錯方向，並且帶着我們一齊錯了。爲防止這種錯誤起見，我們國民黨現在才舉行嚴厲的清黨運動。

c加入國民黨沒有好久，居然能在中國橫行搗亂，爲所欲爲，這是什麼道理呢。大家總以爲是因爲國民黨的度量太寬，組織太鬆，給c以活動的機會，或者以爲是c很兇，很厲害，所以能夠伸張很大的勢力。我不管這些理由對不對，姑且先把構成c勢力的各種分子，根據我的觀察，來分析一下，大概連c本身和跟c跑的這些人，總括起來，不外是兩種。第一種是投機的。這種人是夠不上說什麼革命，任何一個團體，或任何一個黨派，只要有勢力的，他便要鑽進去。在袁世凱勢力之下，他可以向袁世凱上奏摺勸進。在張勳的勢力之下，他可以跟張勳一同留辮子復辟。他們之所以跟c走，完全是我們廣東人所謂「托大脚」的心理，一點價值也沒有的。第二種是錯了方向的。這種人的本身，是有主張，有訓練，有能幹的。他自己並不知道自己是走迷了路，他把c當作模範，當作萬能。他以爲一定要在c的範圍之下，才可以發展自己的能力，實現自己的主張。這種人本身，沒有罪惡，罪

惡的根源，乃在走錯了方向。

在這十多年中，中國的革命沒有多大的發展，俄國的大革命，却大大令人注目。蘇維埃赤紅的金字招牌，已夠令人頭暈目眩了，何況他們又大吹大擂的，宣傳自己好處，如之何能叫一般眼皮淺的人，不慕他們的勢力，而跟他們跑，一般見識短的人，不受他們的宣傳，而跟他們走呢。慕勢力的人，我們不屑去講了，單說受他們宣傳而走錯方向的人吧。受 c p 宣傳的人，他一定深信 c p 就是真理，c p 是不錯的。其實他們所認為千真萬確的，實在是錯誤了啊。主張的錯誤，自從我們實行清黨以來，隨處都看得見的，現在姑且不講，且將事實來證明。

有人以為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以來，力量加緊加大，都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功勞，假使驅逐共產黨，那麼國民黨豈不是要回復到十三年以前的原狀嗎？這是觀察錯誤，代表這一種錯誤的便是汪精衛先生了。汪先生就是因為觀察錯了事實，走錯了方向，所以現在的言論主張，才為 c p 所利用。又如馮煥章先生，因在俄時被 c p 包圍，政治部多為 c p 包辦，所以社會上都很注意他。前天兄弟和吳稚暉先生，蔣介石先生，在徐州與馮會面，我們才曉得他對於 c p 的觀察，極為清楚，也沒有走錯方

向，他並且很曉得武漢那幫人的錯誤，他說，『俄國共產黨是要支配中國的全部，不論千變萬化，總之不離這句話。』這是在馮煥章言論中，最重要的一句話。他後來又把西北方面 c p 搗亂的情形，詳細說出，更可以看出他對於 c p 的觀察是很清楚的。馮煥章先生又說，汪精衛、徐謙、鄧演達，都到鄭州會他，汪徐鄧幾個人都說 c p 如何不好，如何壞，本人如何上 c p 的當，擬開會設法解決，並且自認爲錯。但是我們要注意汪精衛雖罵 c p 不好，却不是覺悟的表示，兄弟在俄國時，也常常聽見俄國人說中國 c p 的工人運動幼稚得很，這正如張作霖大罵兒子不懂事，辦不來事，一個樣子的。汪徐鄧罵 c p，也不過以老前輩的資格來罵罷了，和張作霖以老子的資格來罵兒子，有什麼分別呢？他實在還是在迷途中間。徐季龍在漢口，向羣衆亂吹亂說，『我們越能欺騙敵人一分，我們的道德便更高一分。』他在鄭州，却親自對馮煥章說，『共產黨人騙國民黨，向左，又向左，再向左，左而至於無可再左。』這種矛盾的，可以證明他們是走錯了方向，而且毫無覺悟的。

前天在徐州有一位同志，告訴我，說他曾經把佛經上一段的故事，說給唐生智聽。他說從前印度有一個老婆羅門，能念咒語，使片刻之間，金銀珠寶，從天上落下來，任人携取。有一天，這個老婆羅門被

一夥五百多人的強盜綁了票，老婆羅門叫同時被綁的一個徒弟回去，設法弄錢來贖身。徒弟臨走時，密對師父說，今晚便當月蝕，千萬不要念咒。可是師父並未留意，徒弟走了，師父却想起念咒來了。他就向強盜說，『爲何綁我。』強盜說，『要錢。』老婆羅門說，『那並不難，只要在我頭上加一個花圈，我念咒，錢就會來了，就請放我。』後來錢果然來了，站在一邊的二百五十個人爭取着珠寶就跑了。還有二百五十個人沒有取得着的，叫老婆羅門再念咒。老婆羅門說，『月蝕已過，再咒也不靈了。』於是後二百五十個人以爲老婆羅門故作惡劇，發氣將他殺死，一面追趕上去，和前二百五十人爭珠寶打起來。打倒末了，祇留了兩個人，其餘四百八十八人都打死了。留下來的兩個人，同是珠寶之主，却是還要分贓，同時都起了惡念。甲命乙先去燒飯，乙就在飯中加砒霜。甲等乙送飯來，忽然把乙活活打死，但不久甲也中毒死了。我們從這件故事裏，得著兩個結論。一是貪得無厭的人，自然要走到末路的。一是方向錯誤的人，必自殺而殺人的。這般話不止是可以用爲唐孟灌說法，一般錯了方向，甘爲c. p.利用的人，都應該知道，照他們那樣胡行，結局必定是自殺而殺人啊。

總之，跟了c. p.跑，就是錯誤，就是走錯方向。要免除這種錯誤，我們當然要打倒c. p.。然而關於打

倒。c p 方面，有時也有錯誤之點。第一種以爲 c p 的一字一句，一言一動，一切都要打倒。第二種以爲 c p 的手段方法，都非常之好，都可以利用的，所謂『不以人廢言』。其實這兩方面都不免錯誤。照第一種人的意思，因爲 c p 是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我們既打倒 c p，就只好中止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運動了，這豈不是同時也打倒國民黨嗎？因爲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也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可以借着打倒 c p，而打倒和 c p 不相關，而努力奮鬥的人，以快其排除異己之心，這豈不是很大的危險嗎？第二種人以爲打倒 c p 的勢力，而用 c p 的方法，這也是不對。譬如用俄國的方法爲方法，用 c p 對待其他團體的手段來對待其他團體，這種努力，是不是有價值呢？要曉得 c p 的方法，不外是利用人家，如高唱左傾及擁護 總理三大政策等等的口號，不過想誘人家走上邪路，來給他利用罷了。這種努力的結果，就如大家爭珠寶而共死一樣，算得什麼努力呢？如果這也當作努力，那麼努力的害處，就不堪設想了。所以說打倒 c p 的一切的，和利用 c p 的方法的，都是錯誤。前者的錯誤，是在打倒 c p 而連帶忘了自己本身是國民黨。後者的錯誤，是在利用 c p 的方法來欺騙民衆，無異把 c p 所走的邪路，再走一遍。有些國民黨的同志，自誇背後有多少民衆，這不啻是把國民黨丟開了，效法人家奪

取政權，佔領機關，以圖個人的幸福，那是把唯物史觀，變成了唯我史觀了。

有的人說，c p 很努力，不錯，俄國的 c p 確有很努力的。從前我在俄國的時候，耳聞目覩許多事，可以證明。至於中國的 c p，那就實在不敢恭維，實在沒有俄國 c p 的精神。我們看上海方面，c p 自己批評自己失敗的原因，是因為 c p 的指導者，都躲在背後，沒有出來領導拚命，這就可以證明他們的不努力。再進一步來說，就是俄國 c p 的努力精神，也是沒有價值。何以呢？俄國是學的德國民主黨的方法，努力的人都有報酬，喊口號要錢，遊行要錢，宣傳要錢，除了所謂唯物史觀中的自我主義以外，再沒有旁的東西了。一個人要出了錢來收買，然後纔去遊行，示威，喊口號，宣傳，在不知內幕的民衆看來，他們真是努力極了，試問這種努力的好處，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敢說這些都是走錯了方向。

怎樣的方向纔對呢？對的方向是「中」的，不是偏於一面的。中國的事，有些並不是弄不好，不過是失之太過或不及。凡事要求「中」也不容易。因為這裏所謂「中」並不是「折中」的解釋。我在前四年碰到鮑羅庭，鮑問：『中國的好處在什麼地方？』我說：『中國的好處在「中」。』鮑說：『這個「中」字不好。第一「中」沒有本性，第二「中」一變為調和派，再變為騎牆派。』我就回答說：『不是這樣說的。所謂

調和派，如甲欲十，而乙欲五，調和的丙總說七。所謂騎牆派，乃騎在一堵牆上，觀望二面。「中」是適者生存的「適中」的意思。「中」好像射箭射中的意思。不偏之謂「中」，就是最適中的意思。說「中」無本性，是錯誤的。「中」是在客觀中的「中」，（唯物的）非主觀中的「中」，（唯心的）猶如走路，走的是中間，不能偏左幾尺，也不能偏右幾尺。「中」不是調和，「不中」就是「偏」，就是「不對」。「求「中」而誤解為「妥協」，實在是太誤。總理常言革命，同時又常言「中」，「足見「中」並不是調和，乃求「適中」。總理常講大學中庸兩書的道理，但是總理所講的大學中庸，乃是總理的大學中庸，乃是適者生存的「適中」的大學中庸。

我們現在把搗亂的共產黨清除，同時也要把腐化惡化的反革命份子清除。單單清除共產黨，而日趨於腐化，便是「不中」。單單肅清共產黨，而日趨於惡化，日趨於搗亂暴動的 c p 行爲，也是「不中」。「不中」是不適宜的，是錯誤的。走了這種方向，便是走了錯誤的方向。

我們努力要認清了方向，以後的努力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方向沒有認清，盲目的努力，是沒有意義的，沒有價值的。什麼是正大的方向呢，便是「中」了。我們認清了「中」的方向而努力，這才是青年同

志的使命。大家要認清方向呀。不要像乘汽車而走錯了方向的，只管自以為快，其實已走了許多的冤枉路了啊。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

## 怎樣纔能繼承總理之志業

雙五節紀念演講

總理有時不要做總統有時要爭了做總統是甚麼原故——革命一聲有事 總理馬上便出來爲天下先——對 總理謀叛對吾黨變節的終歸失敗前後一轍——以黨治國有 總理之志則可無 總理之志則不可——總理會說『三民主義以前未曾行於中國反已行於俄國了』——體認三民主義而求其其實現是我們今後重大的

責任

今天是五月五日，乃我們 總理在民國十一年就任大總統的紀念日。此日應與十月十日的國慶節相當。我們爲表示紀念 總理起見，稱爲雙五節，覺得比雙十節的意義還要重大。因爲辛亥革命，不過是中國民族獨立的第一步成功。而且在武昌一役以前，早已有過若干次的革命起義了。如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的一役，規畫本來很大，犧牲也着實可觀，不亞於武昌的一役，至於成敗，本來另是

怎樣纔能繼承總理之志業

一個問題了。所以實在估量起來，雙十節不過是許多革命發難的日子當中的一個，推倒滿清的革命史的末一頁罷了。說到紀念，總理，我們知道，總理乃中華民國的創造者，所謂『國父』是也。總理以總統的職位來謀國家的創造，前後不過兩次。第一次是元年一月一日的在南京，第二次便是十一年五月五日的在廣州了。在南京的就總統職，是推翻二百六十四年的滿清專制政府而創立中華民國的，當時滿清已勢在必倒，為謀指導革命的統一，完成一部分的民族主義起見，所以各省派代表到南京來，舉總理為臨時總統。後來滿庭既倒，南北統一，總理也就退職了。但是論到總理當時退職的情形，事實的表面，一般人所知道的不過總理能做最高的名位，功成身退，為民國公僕的模範罷了。其實以總理一身出處關係之大，我們所應該認識注意的還不止如此，現在不妨乘此機會，附帶報告一下。當時滿庭雖倒，南北雖然統一，國家建設的事業還多，以總理負有創造國家責任的人，豈能就此退休。總理實在因為當時許多的同志，於三民主義中的建設工作，還不明瞭，又和當時受黨指揮的許多軍隊，統同被一時的環境軟化了，對於革命事業，就此懈怠起來。又如黨員章炳麟等，說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荒謬言論，將黨與黨軍離開，於有形無形之中，已成了叛黨的罪人，

黨事於是不可爲，國事自然也就難說了。須知黨是軍的頭目，軍是黨的手足，軍離了黨，沒有了革命的使命，便不成軍。黨離了軍，沒有了實力，還革甚麼命呢。總理鑒於黨義的不明如此，革命便難以完成。自己對於國家，徒擁一個首領的虛名，有甚麼用處，所以慨然退職，以重新訓練黨員，重新鞏固革命的基礎，重新確定革命的策略和工作爲己任，那裏是甚麼功成身退呢。

再說 總理在廣州的就總統職，是在桂系軍閥被逐以後。當時國內的軍閥，原不止於桂系，桂系軍閥，也不過是吳佩孚、張作霖等大軍閥的附庸罷了。所以 總理肅清兩廣以內的軍閥以後，知道革命救國的大責任，就此格外要十分急切，非擔負在肩頭上，更進一步，肅清北方的軍閥不可。軍閥完全肅清以後，就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時候，也就是我國民族完全獨立平等自由的時候。總理於是定了北伐的大計，下了北伐的命令，督率同志，積極進行。當時 總理對於國民革命的責任心，重大極了，至於權利心，却一毫談不到，初不以僅僅兩廣的地域爲褊狹，其他一切環境的艱困也毫不顧及，毅然決然的就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位，表現他唯一的革命領袖指導者犧牲者的精神。總理這一次的就職，意義是何等的重大，何等的深刻，就是十月十日，和一月一日，兩回事情也不能比擬的，然則我們今

天紀念 總理的心，怎麼能不十分感動嗎。

有人問過，說：「總理在南京時，奄有全國，何以不要做總統，後求局處兩廣的時候，何以又要做總統。」總理在南京解職以後，天天去遊山，南京附近的山水遊涉殆盡，我也曾經追隨遊玩，有一次我乘間叩問 總理說：「先生對於國家，是否從此毋庸負責，還是等將來再重行負責。」總理道：「我不居那不能實行主義而徒擁虛名的職位，況且國家目前，暫無重大的事情，非我不可的，我也不不要居政治首領的地位。總統不過是一個公僕，倘於公家無我來服務的必要，我就不做這個公僕，但是國家如有大事，非我做首領不可的，人家雖不給我做，我也是要爭了做的。」總理這番話，實在可以祛除許多人對於他出處問題的疑感，也給了我們做黨員的和中國人一個莫大的教訓，就是我們今天的紀念，因此也更加覺得意義重大了。

還有一件事，現在可以引證的。當袁世凱死時，我國略有生機，有志之士，都想及時奮發，北京政府對於副總統的人選，發生了問題，就是黎元洪代理了大總統的職務，留下副總統的地位來，不知舉誰是好。國會中的國民黨員，頗望 總理出來担任。其時我和廖仲凱同志同在北京，忽然接着 總理一

個電報，喊我們急回上海去。我們到了上海，便將國會中同志的意思告訴總理，總理大不以為然，並且對我說道：『你同仲凱在北京要當心一點，我將要造反了，北京當局既勾結帝國主義者有解散國會的意思，對於國家有搗亂的行爲，我便要討伐他們，你們要小心。』據這件事看來，我們又可知總理將自己對於國家的義務和權利，隨時隨地，看得極其清楚。總理一生全副的精神，都貫注在革命的事業上，革命一有了事，總理馬上就要出來，爲天下先。十一年的今日，我們還覺得總理在廣州就職總統，以革命爲天下先的精神，如在其上。我們今天紀念總理，我們便覺得如總理有國父的地位的，在世界各國英傑之中，尚不乏其人，但像總理這樣肯負造黨建國的責任，領導着全國和世界向前革命，鞠躬盡瘁以終，又留下那樣爲黨爲國，爲天下的偉大的遺囑，古今中外，再難找出第二個人來。所以我們今天紀念總理，便一直感覺到總理的偉大，實在是上下古今無與倫比的啊。

更有一事我們覺得奇怪的，就是任何謀叛總理的，或對於總理所定的黨義變節的，終久都歸於失敗。總理於十一年今日就了總統職位，出兵北伐的當兒，不僅真實的同志共同奮鬥，就是廣東的軍閥陳炯明，也曾參加其中，和去年北伐的當兒，湖南的唐生智也合同進行是一樣的。陳炯明善

於作僞，有他的一種僞狀態，和一番僞言論，來欺騙我們寬博無私的總理。他也曾幫同驅逐了桂系軍閥，肅清了兩廣全境，他便自信他的能力誰也不如，甚麼事他都有辦法了。其時他便勾結了帝國主義，以爲人總不能奈何他了。到了作僞既窮的時候，他便公然反對總理，毀謗總理起來。總理的親自北伐，打到江西，還沒有如現在的成敗，在後方的陳炯明，不但不盡力爲助，反而搗亂起來了。總理不得已，祇好暫時折回。這是十一年今日以後，革命事業所以挫折停頓的原故。陳氏後來更進一步，以叛徒圍攻總統府。總理因爲無兵抵抗，便避居軍艦中，和現在的蔣總司令商議，將軍艦開入省河，奮鬥了五十多天，歷盡了艱險困苦，始終不屈不撓，中外的人，無不震驚欽佩，由此世界上才格外知道總理的偉大，無不加以精神的贊助了。陳炯明等叛徒，後來終久被驅逐掉，蔣總司令和其他同志，後來終得肅清廣東的東江與南路，以至於有目前北伐的成功。究竟這種成功，是怎麼會有的呢，就是憑著我黨的主義和總理生平革命的精神，任何大難前，無不從容渡過，任何奸作祟，無不逐漸蕩平的了。總理又早將他的主義和精神，完全貫輸給他手創的國民黨了，所以今後我們只要自問是總理的真實的信徒，是國民黨的真實的同志，便遇着比陳炯明等更兇的變節者或叛徒，便遇着比圍

攻總統府，避居軍艦等更難的環境，我們一毫也不用怕，只要繼續着。總理留傳給我們的革命的主義革命的精神，猛向前進，這班變節的黨員和叛徒，終久沒有個不倒的，這些困難的境遇，也終久沒有個不破的，這也是我們今天紀念總理，不可以不想到的啊。

最後我們今天還應該體會到我們國民黨的重要的地位。總理是教我們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我們在解釋這一層以前，我們先看一看。總理個人，是自處於怎樣的一個地位。總理生平在任何人面前，都以平民自處，平日穿的是學生裝，出門還不如一個軍長或師長的有護衛。我切記得。總理在廣州，坐小艇過河，步行往高等師範去演講的情形，任何人都不會知道他本來的地位。總理同任何人講話，從來不想起他以前所有的地位，他的精神，祇貫注在他的將來的事業。所以總理的與人接物，完全是平民的精神，完全是虛懷若谷的精神；對於國事呢，却又是一副舍我其誰的精神，不折不磨的精神了。一方面最平和，一方面又最剛強；他是黨的首領如此，凡是黨員，也都該效法他如此，推而至於黨這個團體，也該如此。這句話怎麼說呢，國民黨一方面，是民衆的，是應當以民衆的意志為意志，以民衆的要求為要求的，一方面又是領導民衆而不是追隨民衆的，所以救國建國治國

的大業簡直是舍國民黨其誰，其間沒有絲毫謙遜退後的餘地。在軍政訓政兩個期間，本來人民應操的權柄，須由國民黨暫時代操，並須祇讓國民黨一黨來代操，一切思想，行爲，組織，都是要統一的。這兩個時期間，不能容許多黨來合治，是要唯一的自己担任的。不過如此豈不嫌專制和獨裁麼？這個我們可以斷然的說，是毋庸顧慮的。因爲軍政時期不過是個開創，訓政時期不過是個過渡，目的是最後的憲政時期。總理以伊尹放太甲爲比，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軍政訓政時期等於君主時代之攝政，可見 總理之志，即吾黨軍政訓政時期之志。所以國民黨對於全國的經過軍政訓政兩期，應當和 總理一樣的具有舍我其誰，不折不磨的精神。國民黨在中國，也實在有這種地位，不可讓過，不可失掉。不過凡做國民黨員的人，要明白這種地位的難處，更要自省，有 總理之志則可，無 總理之志則不可啊。

總理之志，究竟是甚麼呢，我們這裏要完全弄清楚。由軍訓兩期，達於憲政時期，固然是 總理建國之志了。但是統一的具體的 總理之志，是應指三民主義之實現而言的。三民主義乃 總理四十年所創立，所以應中國的和世界的要求而創立的；並非用主觀來定的，乃從客觀方面，應合要求而定。

的。我們可以說，今後的世界乃三民主義的世界。但是常常有人疑惑，說現在民族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吧；又說民族主義以外，應該加入民生主義了吧；這些話通通不對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有如一三個相聯的環，在今後的時代中，是要同時具有的，任何的一個，都不能單獨成立。所以三民主義是一個整個的主義，不能接受這一個，而拋棄那一個的。在事實局部的表現上，有時是某一個比較重要，然而并未失掉其他的關聯。就如捉住一個環，同時便捉住三個環，連環的關係，是打不斷的。所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與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等國，幾十年以來所持單獨的民族主義不同。單獨的民族主義一變為國家主義，再變為軍國主義，更進一步就成為帝國主義了。本來民族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而偏端發達的結果，自身却變成帝國主義了。所以如此的原故，就是因為沒有民權民生兩個主義的規範調整於其間。假如兼有民權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便再不會用政治的經濟的勢力，去侵掠他人，壓迫他族了。於此可見三民主義實在完善的，確為救時的良藥，不止現在，而且是將來的，不止中國，而且是世界的。總理曾經說過，三民主義在中國還未實行，反而先行到俄國去了，這句話是顯而易見的。倘若俄國死守着馬克斯主義，俄國且無從推倒俄皇，俄國皇族的專制，間接且及於土爾其、蒙古、

波斯等族；現在內外各民族一齊獨立了，這就是民族主義的解決，在俄國雖已算大革命，其實不過同於我國的推倒滿清罷了。我在俄國會見他們的最高經濟委員會的會長托羅斯基。他們對於這人，有極深的信仰，以為他的主持會務，一定和辦紅軍一樣，可以收莫大的效果的。我問他：『目前所行的新經濟政策如何，是否由此便可以到共產的一條路上去。』他楞了半天說：『這種事情，猶如泗水過河一樣，必定要等泗到彼岸時，才可以告訴你是泗到了。』可見他們對於共產，現在實在還沒有把握。他們的新經濟政策固然是不能不對於農民的讓步，而尤其是一面節制資本一面生產資本，完全便是總理的民生主義的初步。所以總理說三民主義反而在俄國先實行了，是的確的啊。馬克思乃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他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據他所得的材料極端分析，來下結論。至於在他所得的全部材料以外有得不到的，當然他的結論就不能包括了。我們知道他的材料祇限於歐洲各國的，美洲的材料他得的不多，何況亞洲中國的材料呢。他研究所得的結論因為受空間時間的制限不能完全正確，是應該的。否則馬克斯變成預言者，而不是科學家了。列寧居於歐亞之間，比他得的材料多一點，所以在第三國際中，除『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以外，又加上一句口號道，『世界被

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這無異乎告訴我們單用馬克斯的主義，已經不敷，非請三民主義當中的民族主義來幫忙不可了。所以照這樣看來，馬氏祇懂得民生主義，列氏加入民族主義，懂得多一點了，但唯我們總理才懂得的最完全。他創立民族，民權，民生，整個的三民主義，免除了各方面的弊病和短處，不但適合中國用，而且適合世界用。總理之志，就完全在此。我們如果不革命則已，不談世界革命則已，否則一民或二民主義是斷斷不敷的。體認三民主義而求其實現，這更是我們今後重大的責任。我們須記得「總理『同志仍須努力』」的一句話，才配紀念總理。

國民主義者之使命

四八

## 要磨鍊我們的革命力量

五月二日在國民政府紀念週演講

肯犧牲便增加了各箇黨員的力量——守紀律便增加了各級黨團的力量——尤其在黨的危急存亡的當兒要磨鍊我們的革命力量來護黨

我們這回護黨救國，簡單的說，就是消滅黨內的絕大危機，恢復國民黨的黨權，使我們得以本總理的革命遺志和精神，繼續完成三民主義以救中國。我們要本着 總理的革命精神和已往的事業，一致努力打倒反動派，要用最大而必要的手段處理叛黨賣國的惡勢力。我們以黨治國的本意，就是要能改造中國，消滅反革命。上月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陣地以內，發生共產黨搗亂的大危險，將我們國民革命的戰線拆破。廣東，福建，江西，和上海的黨員的陰謀，各處都是一樣的暴露出來。本黨重要的人員，幸而早已知道，各地同志，又能各自努力，所以共產黨的陰謀一暴露，本黨就能將搗亂的反革命的份子，一鼓而殲滅之。若再遲一星期，那就說不定我們的國民革命被它完全破壞，我們的黨要

亡，國也要亡了。這是我們爲了要鞏固國民革命的基礎，爲了要救黨，爲了要救國，纔於忍無可忍的當兒，用這種切實平亂的方法及手段，來驅除共產黨。

國民黨是 總理幾十年革命奮鬥的精神和事業的結晶，是絕不能任人危害的。我們的黨，有黨員百萬，爲中國唯一的大革命黨；在歷史上時期上說，是中國最大最久的黨。總理依着中國民族的需要和切望，定下了主義和政綱，爲人民謀解放，所以也是很有力量的黨，好像一個很強壯的人，無論喫什麼食品，都可消化的一樣。但是這次幾乎被共黨破壞，其原因可歸納爲二種：（一）共產黨的陰謀；（二）我們本身的缺點。

共產黨的陰謀是什麼呢？簡單的說，就是它的寄生政策，好像藤條植物寄生在一株大樹身上，吸取大樹的精髓和滋養料，而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令大樹日就衰弱而至於枯死。這是完全和 總理容共政策的本意相反的。總理所以容共，是要共產黨黨員用正當的手續進黨，使其個人加入，信仰總理的主義，努力革命的工作，不是要他們來藉本黨的名義和實力，去養成他們另外一個黨。現在他們破壞北伐大計，毀謗我們革命軍的領袖，用險毒的宣傳，顛倒是非，分散我黨的團結力。這還不過是

共產黨這次陰謀的一部，若是把他們的全部陰謀總括起來，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對於本黨，第一步是竊取黨權，第二步是竊取政權，第三步是攘奪軍權。但是他們進行這種陰謀，所取的手段是反革命的，所用的方法也是反革命的，所以就隨時隨地暴露了他們反革命的醜態，而我革命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也不難的就認識了它。假使他們的陰謀到現在還沒有認識出來，吾黨的基礎和中國革命的事業，就要受莫大的挫折，不止是如這次僅僅被搗亂而已。

國民黨何以會被共產黨如此搗亂呢？這就要責備我們本身了。第一，因為我們團結不堅，所以他們有機可乘。卽以一二變節的軍人而論，自以爲勢力雄厚，革命有功，便事事自專，忘記了黨，因而忘記了黨是要團結三民主義的同志，而不是要團結非三民主義的另外一種人，這是他們沒有矢忠本黨的決心，所以就會被人誘惑，就會被人拆散。第二，我們的黨員對黨不甚密切，不甚密切的緣故，就是組織不密，紀律不嚴，所以共產黨得以侵入搗亂。第三，一部分黨員對於本黨政策黨綱和組織方法，不大明瞭。假如問他以中央黨部現定何種政策，他必不能答。若問某一區黨部或區分部的辦事人的組織方法，亦必罕有能答者。而且，各處黨部集會時，黨員不能熱心赴會，也是一個毛病。譬如廣東黨員很多，

但有幾個區分部，每次開會，到者寥寥。有些黨部內黨員名字很多，而辦事人甚少。下級黨部是黨的基  
本組織，基本不固，如何有好的結果。這三點，都是我們黨的缺點。歸結起來，還是沒有訓練的緣故。譬如  
打仗，兵士未受訓練，那裏還能打仗。革命黨是和普通政黨不同的。普通政黨黨員，專供運動選舉之用，  
本黨則不然。本黨黨員，是要本着主義黨綱和政策而奮鬥的；我們的奮鬥，一方須要自動的明瞭黨的  
主張和組織，一方須要在黨的組織之下作團體的行動，做黨的工作。這兩點都非靠訓練出來不可。

現在國民革命軍已戡定東南，而實際的革命工作，方始開始。這個時候，我們同志，就要領受已往  
的經過作教訓，再不要任從前的缺點來阻礙我們的進行。我們要明白黨的趨向和方針，要把我們自  
己放在黨的指揮之下，要為黨團結，為黨犧牲。總理說：黨員無自由，應該求黨的自由。求黨的自由，就  
是要黨員有為黨而犧牲的精神，犧牲不是逞血處而喪命，是要把個人的時間、精神、能力、智慧，通通給  
黨來用而不求報酬，這纔是有益於黨有益於國的犧牲。這纔是革命者的大的犧牲。這種犧牲，可以說  
是我們革命者的第一種道德。

革命者往往有一種毛病，是偶然的興奮與平時的浪漫。興奮固然也有好處，遇必要的時候，精神

振作一下子，工作就能馬上收多少效果。但是一時的興奮是不能持久。總要把興奮鍛鍊成毅力，乃能百折不撓。浪漫就不能守紀律，這便完全要不得的。本黨紀律，要與軍紀一樣嚴明。軍隊要紀律，才使兵士不散漫，散漫則沒有戰鬥力。黨也是一樣，黨員散漫無紀律，則人各一心，就失去團結了。兄弟再把這一點移到政府這方面講，就是在政府服務的同志，不能恪守紀律的往往也不少。實在黨員服務，要比任何人都努力，比任何人都守紀律纔對。有些同志，因不知紀律的意義，便使指揮者不易行使職權。兄弟從前追隨總理，兩任秘書長，每天未到辦公時即來，晚間過了辦公時還不去，但是那些辦事的人，却不守時間，屆時不到，未屆時即走，我一人那能監督得許多。而且有些是追隨總理多年的人，又是革命的同志，我若責備他們，他們一定說我太嚴。因此，職權上面就減少了效能。現在我們要避免不守時間的毛病，無論在什麼地方服務，總當自己努力，不應說指揮者不好。還有一層，我們在政府辦事的人，不要自命是什麼官，我們是有紀律有統系有目的的革命黨人，即在政府辦事，也不過是公僕，若染了一點官氣，那就壞了。有些人以為爲入黨可以做官，得便宜，於是投機份子，來要求加入本黨了，其實本黨黨員，不惟不能得便宜，還要吃虧。譬如平常人犯法，可以從輕發落，若遇國民黨黨員犯法，其罪一

定要比普通人加重。因為黨員是代社會服務，為黨國服務，所以他的責任是多層的。他不但要守法，還要護黨，還要救國。他的責任愈多，犧牲應該愈大，享幸福就應該愈少。最後，黨員中有些人自以為是老党员，就放蕩起來，驕傲起來，也是要壞事的。我們革命是長期奮鬥的事，要無驕傲放蕩心，纔有進步。我們要知道，這樣大的國民黨，怎麼被共產黨搗亂得這樣，怎麼革命到幾十年還沒有完全成功。照此一想，那驕傲心就沒有了。辛亥革命，本可以統一南北。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黨員太驕傲，不肯接受總理的三民主義。假若從今以後，黨員還是要驕傲，總理的主義，便永無實現之日，革命事業，也無成功之期了。驕這樣東西，所以能侵入的原因，是由於一事本不易做成，而竟完成了，遂不知不覺起了驕心。辛亥革命，本來不料成功如此之速，而竟於短時期間成了功，所以便生驕心。如果當時大家以為滿清雖被推翻，專制餘孽尚未剷除，民生主義尚未實行，那就不致驕傲了。現在我們也應該除去驕心。國民黨被共產黨侵入，是如何可恥；三民主義尚未實現，是如何可惱；這樣一想，要驕傲也驕傲不起來了。如若我們以為共產黨已肅清了，軍閥也快倒了，還憂慮什麼呢？那驕傲自滿的心立見驕與滿，都是不求進步的代名，都是失敗的預兆。絕對要不得的。總括的說，去驕心，戒官氣，守時間，戒浪漫，都是政府中

人守紀律的先決條件。守紀律就是革命者的第二種道德。

兄弟現在再總括以上的話爲三點：（一）要恪守紀律；（二）要有犧牲的精神；（三）要拿這兩種革命的道德來充實我們黨的組織，增加我們和黨的關係，提高我們對黨的認識。能犧牲，便能生出黨員個人的力量。能守紀律，便能團結黨員全體，發揮黨的力量。黨員是應該人人有力量的，黨尤其是應該有力量的。我們要拿出犧牲和守紀律的精神，鍛鍊我們自己來革命。尤其在黨的危急存亡的當兒，要磨鍊我們的革命力量來護黨！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

## 青年的煩悶與出路

現今的青年都感着煩悶，尤其是覺悟的青年越感到煩悶。

煩悶的來由，固然有種種；政治的不清明，社會的不安寧，都直接間接給青年以重大的刺激。但這都不過是刺激罷了，還不是煩悶的總因。總因是：青年正在生理的發育最緊張的時期，血氣是剛強的，筋肉是飽滿的，天機是活潑的；也的生理的發育，使他時時刻刻起種種的衝動，而這些衝動是無目的，無惡意的，無選擇的。簡單言之，他的生理上的要求，只是使他好動而惡靜，只要給他滿足了，就可算得是『得遂其生』。如果遇着環境的障礙，給他一個不滿足，他便不知不覺的起了心理的煩悶。心理的煩悶一起，他便不知不覺的埋怨一切的環境，詛咒一切的制度和習慣。我並不是說一切環境都是好的，更不是說一切制度習慣都是對的，我所着重的是：如果我們分析青年生理上的發育現象，就可以解釋他心理上的煩悶；從他心理上的煩悶，就可以解釋他對於一切環境的不滿。

因為青年的生理發育最緊張，於是他的慾望也最亢進。就中國一般青年說，他們最普通的慾望

有四種：(一)求知慾；(二)性慾；(三)佔有慾；(四)支配慾。這四種慾望，佔領着青年全部，而且支配着青年的全部人生觀。在舊社會的環境尚沒有改造成成功的中國，青年這四種慾望不能滿足，是毫無疑義的。不能滿足，便起煩悶，所以現在中國青年最感煩悶的切身問題，就是：

一、讀書問題。青年的求知慾是強烈的，讀書當然是求知慾必然的結果。有時讀書問題，在青年心目中簡直佔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把支配慾佔有慾性慾問題都暫且擱開，首先為謀滿足求知慾而讀書的，這種實例倒是很多。好些青年，在求知慾最高的時候，為了讀書，竟可以犧牲了戀愛，這種實例也不少。前幾年家庭問題鬧得最凶的時候，青年往往因為要求婚姻自由，幾乎人人都要和家庭翻臉，而同時却有多少人並沒有和家庭翻臉的，其原因就是「為了讀書，不得不要家裏的錢；要它的錢，只好服從它；要服從它，就好犧牲了婚姻自由權。」這種青年便是為了要讀書而情願犧牲戀愛自由的。有人以為這是一種缺乏奮鬥精神的青年，實在是冤枉了他。求知慾支配慾佔有慾和性慾，既然都是青年的慾望，而事實上又不能同時滿足，那自然就有一個先後緩急之分。求知慾比較強的青年，犧牲了婚姻自由，抑制了佔有慾，甚至忍受家庭無理的支配，而求達到讀書的目的，這豈是缺乏奮

鬥精神所能做得來的嗎？凡是奮鬥，都要忍受幾方面的犧牲，而達到一方面的目的，都要忍受許多的缺望而滿足一個急切的需要。在青年心目中，有時讀書問題比任何問題佔的地位都高，有時戀愛問題比任何問題佔的地位都高，有時讀書戀愛都不覺重要，而求活動求事業的問題反佔重要的地位。這都是隨着各人生理發育的程序和特性而差異的。當讀書問題在青年心目中比戀愛問題還覺重要的時候，失學的痛苦也許不減於失戀吧。所以我們只看青年在戀愛上努力而忍受了種種痛苦，或只看他在讀書上努力而忍受了痛苦，只看他的一面的努力而稱許他能奮鬥，或只看他的一面的忍受痛苦而批評他不能奮鬥，都不是對於青年合理的態度。我總認為青年是生理發育最旺盛的時候，如果他生理上是健全的，沒有先天的缺點和後天的殘廢，他一定是能夠奮鬥的。所以問題並不在那個青年能奮鬥，那個青年不能奮鬥，而在如何發展他的天性和能力。青年要求在讀書上面來發展他的天性和能力時，只怕誰都要承認他是正當的吧。可是在中國現狀之下，青年要讀書，便要遇着種種困難，種種障礙。大多數青年，困於窮乏，不能求學和不能升學的，固是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少數不受經濟壓迫得升學的青年，又擾於社會的不安，和政治的紛亂，不能安心求學，只看幾年來全國的大中小

學，不是因為無錢停閉，便是因為欠薪罷課，不然就是因外交上的慘案罷課，再不然就因內戰陡起，交通阻隔，學生困在家園不能返校，或是學校受戰事影響不能開課。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教熱心求學的青年如何能不煩悶呢？

二、戀愛問題。性慾是本能之一，儒家說：『食色性也。』性慾與食慾並舉，實是一語破的。何況青年在血氣剛強的時候，色情的衝動，本來只有盲目的要求，那有自制的能力？而且在中國因為一向把未成婚的男女關係，用『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約束得很嚴，就是男女婚姻，一向都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縱有怨偶，大家也歸之於天命以自慰，所以幾千年來，社會只把性愛納諸禮教的約束當中，却沒成爲什麼大了不得的問題。自從自由結婚的思潮流入中國，愛倫凱結婚必基於戀愛的話，深入青年人的心，又因少數青年研究介紹西洋文學的結果，使一般青年都沉醉於戀愛的迷夢中，性愛問題便成了青年切身嚴重的問題了。這些青年人所接受，所信仰，所沉醉的一切，都是和中國一向的風俗習慣相背謬的。你要自由，老習慣叫你服從父母；你要結婚先有戀愛，舊風俗說，男女是授受不親的。社會既沒有承認男女的交際爲正當，青年人自然很難得有自由選擇配偶的機會。意中人尋不着，

青年人是照例要發生『何處是我的歸宿』的悲哀的，就是偶然給你遇見了一個戀愛的對象，還怕是你自己害單思，即使有了雙思的條件，經過了相當時期的『弄情』，英語所謂 love making，彼此都有願為配偶的時候，又許有家庭社會或其他無可奈何的障礙不容你們結合在一起。不少的青年人或許衝破了一切家庭社會的藩籬，老實做了舊風俗習慣的公敵，又往往遇着自由戀愛的毛病，結果為求自由反而得着不自由。所以現在的青年，爲了性愛，跟着舊禮教走的，固然有煩悶，隨着新思想走的，也還是不自由。這就是因爲太不自由，和太自由，都會生出不自由的同樣結果。由這一個同樣的結果，所生的煩悶，現今的青年，有幾個沒有經驗過的呢？

三、經濟獨立問題。這幾年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女子的經濟獨立問題，成了婦女解放問題的中心論點，而青年男子的經濟獨立問題，倒反沒有人注意。其實中國民族的生存問題當中，青年不能獨立謀生存，這個問題如果不是比女子謀生存的問題更佔重要地位，至少也應二者一樣注重。一般人的下意識底下，只以爲青年是受了教育的，有了相當的學問就自然謀生有路，所以就漠視了這一個問題。然而事實上青年所感受經濟不能獨立的痛苦，已經成了普遍的現象。青年入學的時候，

幾乎沒有幾人不聽着他家裏發出一種『不能擔負學費』的哀聲。好容易湊得一年半載的學費給他上學去了，而家裏還要焦着心腸，給他籌下學期的學費。家裏既然如此的過了今日又愁明日，他到了學校裏想想家裏的窘狀，也是憂多於喜，那裏還能安心求學？這是一般家庭的窮乏，已足以引起青年心裏的煩悶了。進了一個學校，甚至得了升學的幸福，他自己還須得憂慮，因為究竟畢業之後，他是否能夠獨立謀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就一般的現狀看來，中國現在的學校，是不能給學生以獨立謀生的技能的。教育的失敗，便是青年謀生的最大障礙。不幸中之幸的，就是我們社會的人才同時最感缺乏，所以畢業後的青年，多少還能遇着不被社會事業所遺棄的機會。然而因為沒有真賞技能，或有真實技能而遭遺棄的，這種青年尤佔大多數。青年們的佔有慾是最強烈的，但是經家庭的窮迫，教育的不健全，和社會的不接受，他們的佔有慾就完全陷於失望的境地。由這種失望而生的煩悶，在二十五歲以上的青年當中，比任何煩悶都實在嚴重得多。

四、事業問題。青年要做成一件事業的心理，大抵起於支配慾的居多。但是我們這裏所當分別的有三點。其一，求知慾和性慾，佔有慾和支配慾，都是社會的遺傳，換言之，就是得諸模倣社會的習慣。

或環境的傳染。其二，這四種慾，在作用上都是交相連結的，不易分開的，所以青年的一種慾活動時，其他三種慾也常常夾在一起活動的。譬如戀愛時，支配慾和佔有慾都會跟着性慾一起活動的，這就是明證。其三，支配慾固然是和其他三種慾相通，但是如果經過健全的教育的訓練和改造，沒有良善社會組織的扶持和國家的利導，則只能成爲自私自利的支配慾而已。青年的事業，本來要基於創造慾，才不至落到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因爲創造慾發展的結果，如發明家、科學家，純然是利他的，是服務人羣的，是不希冀報酬的。但是在中國幾乎沒有教育沒有社會組織沒有國家建設的現狀之下，只能使青年發展支配慾而不發展創造慾。不能發展創造慾，就是民族建設的力量要衰落下去，而他方面支配慾發展的弊害，不是因爲不能作出正當事業而起煩悶，便是因爲失了一切藩籬而衝成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這兩種弊害，不是民族生存上的良好現象；深切言之，其不良足以陷中國民族於絕望。眼前中國個人主義的普遍，引起社會的紛亂和煩悶已經不少；這種紛亂和煩悶，可以說得是個人主義者的支配慾成功的結果，和那些作不出正當事業的青年由支配慾失敗而生的煩悶結果，完全沒有兩樣。所以中國現在的青年，因爲不是發展創造慾，而是發展支配慾，在事業上便生出兩種結果：

(一)支配慾成功，便是個人主義；(二)支配慾失敗，便是消極主義；二者都歸結到社會和個人的煩悶。

青年們爲了這四個問題，都陷於煩悶當中；這個時候，於是有許多人爲他們說法，總合這幾年一般人的對於青年的態度，約不外三種：(一)禁慾主義；(二)縱慾主義；(三)三民主義。其他出入於三種態度之間而無系統的主張的，我們可以略而不論。

(一)禁慾主義者說：青年們好好地去讀書吧；讀書就是你們的出路，讀書你們就可以忘記了煩悶，讀書你們就可以得到了無限的安慰。求足了學問，你們就可以謀生，可以作事，可以得到愛妻，可以改造社會。所以，你們一定不要性急，求學的時候，只管求學，其他一切問題等你們有了學問再來管罷。這一派人的話，表面似乎把青年一切煩悶都信託於書，讓青年到書本子中去慢慢尋求解決，然而心裏却主張青年人是不應該談自由戀愛的，不應該憂慮將來經濟不獨立的，而且不應該憂慮將來沒有事做的；青年人所應該做的，只有讀書一件事。試想青年們的感覺是靈敏的，天性是活潑的，感情是亢烈的，叫他們耐着心腸去讀書，就行了嗎？學校裏所教的，終是這麼幾本沒有進步的老教科書，所請

的終是這麼幾個沒長進的老教員，所講的終是這麼幾本沒改變的舊講義。有些青年聽了禁慾主義派的教誨，書自然會讀的不少，可是人却是越讀越糊塗了，漸漸地只認識這麼幾本老教科書，只聽到這麼幾篇舊講演，而不知世界的形勢社會的變遷了。讀文學的只知有風花雪月，讀哲學的只知有唯心唯物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汨沒了性靈，還要不認得世界和社會的實際，多數青年終於會有一天忍不住外來的刺激，禁不起心頭的煩悶，而不能不走向別方的。

(二)於是縱慾主義者就說：青年們來吧，來革命吧，讀什麼書呢？現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不是讀書的時候了；而且，讀多了書，就會變成反革命。智識階級多數是反革命的。我們革命，還要打倒智識階級哩！本來，讀書可以滿足青年的求知慾的。縱慾主義的共產黨深知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能滿足青年的慾望，而且深知青年的慾望是什麼，所以就拿出一套足以麻醉青年的法寶，向青年工作起來。它的法寶是什麼呢？第一件，叫做誇大狂。青年的求知慾，是帶着一個畸形的好奇性的。如果你能滿足他的好奇心，他的求知慾也就可以不向求真理的方向發展，而偏向求新奇的方向發展了。共產黨的誇大狂正是引動好奇心的嗎啡針。你要什麼知識呢？共產黨是用不着知識而可以征服全世界的。無

產階級都是沒有知識的，但是只要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大革命，就可以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了，那還有旁的人敢說我們沒有知識嗎？這一種口調，原來是反乎常理，但唯其反乎常理，才顯得出新奇。有些青年因為長久處在煩悶中，自然容易接受這種新奇誇大的宣傳。他們那裏會想到秀才造反，三年尙且不成，何況不要知識的人，豈能革命呢？又那裏會想到如果真要打倒知識階級，爲什麼共產黨不就先打倒發明這個口號的人呢？俄國大革命後，蘇聯政府規定全國一切機關工廠等的職員月薪，最高的不得過二百三十盧布。但是懸二百三十盧布的月薪，在俄國找不出一個專門人才來管理一個高加索煤油礦，蘇聯政府便不顧法律，却破例每月花了二萬盧布去請了一個美國技師來管理這件利益豐富的事業。這就可證明共產黨一面喊打倒知識階級，一面又要優待知識階級；共產黨這種對着衆人打自己的嘴巴的事實，中國青年們又有幾人知道呢？所以共產黨自己並不是不要知識，只是拿不要知識的口號去放縱青年好奇的心理，同時也就騙到一般沒知識和懶於求知識的青年人去替它作犧牲，受其欺的，固然得以大大發洩一點好奇心和懶學心，然而欺人的共產黨也就大大發洩它的支配慾了。

尤其狡猾的，就是共產黨的第二件法寶，叫做性交自由。這個法寶的作用，簡直不僅僅可以投合青年的色情狂，並且足以麻醉青年的好奇狂支配狂和佔有狂。什麼裸體游行，男女同浴，打破廉恥，在事實上雖不必共產黨的青年個個有此舉，然而以此作宣傳的工具，已足以誘惑一般人的好奇心和性愛慾。戴季陶同志前兩年對於施存統張春木的故事，很抱不平，而C P却認為是對於C Y男女最妙的辦法。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和假借孫總理之名的大學當中，更是盡天下男女之奇觀。還有一次一個共產黨員強姦了同黨一個有夫之婦，雙方鬧到黨來審判，而裁判的人只說：「強姦人的固然是幼稚病，但被強姦的也未免思想落後！」所謂幼稚病，所謂思想落後的批評，真是再妙不過。共產黨來到中國，是奉旨犯幼稚病的，儘管強姦有夫之婦，算不上何種罪過，而怕受人思想落後的批評，就只能任人強姦。——這一段風流公案的裁判，令人想起在武漢被強姦的多少國民黨員。我相信柳子厚的河間婦人傳，是一篇懺悔的文字，可惜他們都沒有讀過。——中國一般人受了共產黨的渲染，性問題的文字也就越發風行。就中有個所謂張競生的，竟放着多少事情不去做，却窮年累月去研究這個與有生以俱來的舊題目，而一般人倒以為奇這。新種又幼稚而又思想落後的性狂家，却更遠在別

具肺腸的共產黨之下了。或者老實一點說，青年是應該有相當的生智識，然而研究性智識教人懂得衛生和優生也就夠了，何以所研究的又不特與衛生學和優生學的目的無關，並且只會把青年都葬送到肺癆病的窟中呢？只要看那些做共產黨而兼性狂家的人，如蔡和森瞿秋白之流，無產階級專政尚未成功，癆病却已到了第三期。縱使他們把中國青年犧牲了一大半，做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怕是癆病鬼專政吧！

末了，共產黨的第三件法寶是捧場，而第四個法寶是收買。青年的支配慾和佔有慾是後天發達的居多，而且青年人最得意的也不過是初出茅廬，懷着支配慾和佔有慾的，比較還是希望不奢；但是共產黨却盡量地給CY一個超過奢望的捧場和酬報，青年人那得不爲所顛倒呢？馮煥章同志告訴我，說陝西的農民協會委員長不過十幾歲，上海工友都知道李立三等都發了大財，陳獨秀不知個中玄機，還在CY開大會時，說『中國的CY不該竟做了CP的工作』，無怪共產黨說他還是右派。共產黨如此激進青年的支配慾和佔有慾，幾個青年人能夠不入彀中呢？許多人都曉得說：理想中的共產，須得要支配慾和佔有慾低減到消滅的程度，才能實現。現在共產黨却以虛榮和金錢去誘致青年，

激進他們的支配慾和佔有慾，這那裏是走朝着共產主義的理想所走的路呢？這一說雖可以顯出共產黨的作偽，然而我們也要看透共產黨所以用虛名厚利去勾引青年，其目的並非推行共產主義，實是要取得民衆，擾亂社會。因爲列寧的秘訣是：亂，大亂，才是少數黨徒能夠奪取政權的唯一機會。

總括地說，共產黨的縱慾主義，是要縱好奇慾，縱淫慾，縱名慾，縱利慾；這無一不是以獸性的個人主義爲出發點，亦無一不是以獸性的個人主義爲歸宿點。縱慾，才能迷惑民衆，迷農人，迷工人，迷青年男女；縱慾，才能生亂，亂人性，亂家庭，亂社會，亂國家，亂世界；這就是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戰術。從重重疊疊的亂當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奪取政權，這便是共產黨的最終目的。爲了共產黨少數人這種主觀的目的，於是生出種種造亂的主觀策略和戰術；爲了要施用主觀的策略和戰術，於是採用了一個投合個人主觀的縱慾主義或快樂主義；結果，無論共產黨成功或失敗，天下人都要生出普遍的主觀的痛苦和悲哀。所以，青年人從禁慾主義中被勾引了出來，却又要死向縱慾主義中去；所謂工具的犧牲，還有過於此的嗎？

以上這一切，都是卑之無甚高論。只是這樣討論下來，我們得了三個主要論點：其一，就是青年的

慾望不滿足而起煩悶；其二，就是禁慾主義者不滿足青年的慾望而使青年別尋出路；其三，就是縱慾主義盡量激增青年的慾狂而陷青年於死路。於此，三民主義者，就不能不救救青年了。

(二)在三民主義者的立場，我不是主張像禁慾主義那樣否認慾的存在，或認其存在而認定凡慾都是惡的，更不是主張像縱慾主義那樣純以利用人們的獸性爲造亂的工具的。其實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二者都是謬誤的，其謬誤可以舉二事來證明。從前孫少侯學佛，坐關三年。他不僅是禁慾，簡直是斷慾。但是他經過坐關之後，在還俗的那一年之中，犯了九個女子。這是在一個時期性慾獨強的故事，可見凡慾都不是人人平行發展的，而且因爲斷慾，慾反橫決起來了。孔德少時，愛了一個女子，經兩次的求婚，都被拒絕。過了多少時候，她就死了。他因此就將他的愛情升化起來，轉而用於求知，遂造成他的哲學統系，爲社會學的先覺。這又可以證明人生的慾，是可以變移的。三民主義固不否認慾，但是認定慾是隨人不同，慾和慾的發展，其次第不同，其強弱亦復不同。不但如此，慾是可以變移的；譬如以發洩性慾的精神去求知，以發展支配慾或佔有的精神去求創造求發明，這都是合乎今日科學的教育的精神。孫總理說：『古人所謂天理，其實屬於人，所謂人欲，其實屬於天。』又說：『人的本

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性質。換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高尚，所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這段話，就認定人的獸性和人性都可以改造的；慾改造而成理性的進步，理性造就而求社會人類的進步，這才是革命的教育的最高目的。』

從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的種種相反的差別當中，還可以看出這兩個主義有一相同的短處，就是二者都是歸結到個人主義。因為禁慾的成功是獨善其身，而其末路便是反動的放縱。至於縱慾主義的成功和失敗，更不必再說了。縱慾禁慾，都是利己。唯三民主義承認凡慾都有其相當的功用，而在乎調理造就之得其道，得其道，就可以利人。總理說：『我們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己，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等，此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於利人者，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而爲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

以謀他人的幸福。』禁慾主義是消極的利己的，所以成功不過獨善其身，失敗則無補於世亂；反之，縱慾主義如共產黨之所提倡，則簡直是。總理所謂『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而『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以返於『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的了。三民主義者却是。總理所謂『重於利人者，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以謀他人的幸福。』三民主義所以提倡利人而反對利己，就是由於觀察過許多歷史的事實，深知人慾是天然的；天然的就原無所謂善惡；由天然而生的入欲，於一個時代適於社會的生存和需要，則入欲也就是善，善就是道德；於一個時代有害於社會的生存和需要，則雖天理也是惡，惡就是不道德。所以利己的欲望，如支配慾，佔有慾，放縱起來，便會危害社會的生存，違反羣體生活的需要。然而天然的欲可以造成人爲的理，所以三民主義提倡把利己的慾改造成爲利人的理。依中國現狀的需要，支配慾和佔有慾是要改造的；依生理學衛生學和優生學的指證，性欲是要節制或糾正的；更依我們中國的需要和科學知識的貧乏，求知欲是特別要提高的。總理說：『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有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爲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爲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爲實行家。此三種人互

相爲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總理這一個發明，是他對於人性的觀察社會的建設和國家的建設之總結晶的一段話。我們看這段話，就可知三民主義對人性是持着一個多元的認識，於教育上是主張依三種人不同的天賦而發展其才能，以供社會人羣的需要，於政治上是要依三種人的才能組織一個使「此三種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的國家，以求發展人類的文化。所以我於此更要拿總理關於平等精義的話來勸告今日的青年和革命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生理發育正盛的青年們，用不着煩悶吧。只要認識自己的聰明才力，向三民主義求出路，那就一定不會走上禁慾主義者所給你們的絕路和縱慾主義者所給你們的死路了。依三民主義所指示的路徑，在這個革命時代的需要，青年必須要發展他的創造慾；要給一切慾以正當的出路，也須得以創造慾的發展爲鵠的。分別的說，創造是求知慾的直捷目的。求知須得求於一個時代的需要有關的知

識，求足以供一個社會的實用的知識。離開了社會需要和時代的實用，便沒有求知知識的意義和價值。前幾年有句很通行的『爲學問而求學』的話，被大家誤解了，反而變成一句反對『求學以致用』的口號。不知當初說這句話的蔡子民先生，因爲看見了中國人一向都是『爲做官而求學』所以才說出『爲學問而求學』這一句話來糾正大家向來的錯誤觀念。他所以要打破向來『爲做官而求學』的觀念，就是因爲這個科舉時代的舊觀念是不適用於現在；歸結起來，他的話何嘗是反對『求學以致用』的呢？可是現在一般縱慾主義者却又把『求學以致用』的話，變爲『不學以求用』的精神。他們不要青年求知識，但要青年求新奇，而是否適用則完全不管。不求知識，專務新奇，便使一般青年們見着極腐敗極復古極陳舊的事物也驚爲新奇。前年鄧演達在俄國見我，拿出了他在德國同幾個不知名的女子合拍的裸體照片，說道：『你看這是多麼文明！我當時就答道：『你若說是多麼「新奇」，多麼「自然」，多麼「美麗」，或多麼「野蠻」，都還說得上，若說多麼「文明」，則你還比不上牛馬豬狗那樣「文明」。』因爲你脫掉衣服，還只是一時的事，而這些獸物簡直是長期天然的裸體，豈不是照你說，牠們都比你「文明」多了麼？』人在古代野蠻的時代，就是沒有穿衣服的，這事原是

極古極舊的，而鄧演達反以爲新，以爲文明，這豈不是笑話這一事，就可以證明共產黨的方法，只是要窒塞青年的理智，使之不辨菽麥，然後才會跟着少數專制階級去指鹿爲馬。照這種辦法，一定會弄到青年們連自動的求新奇的能力也會漸漸汨沒了。因爲共產黨是新式科舉主義者，目的在使民衆閉聰塞明，不知道自身的真實需要，社會的真實需要，所以才採用離開一切做人的需要的新奇品，去迷惑青年的肉眼。這樣，肉眼是迷了，但是智眼也同時塞了。共產黨如果成功，青年又如果弄到這樣地步，中國民衆當中先知先覺者固要絕滅，連後知後覺者也要絕滅，剩下來只有大多數無領導無發明無指揮的不知不覺的愚民，到了這種地步，就是連那當初靠愚民政策成功的少數共產黨專政階級，也要如古代專制皇帝的子孫，一代一代就要退化下去，成爲昏庸頑魯，以至於倒場，而中國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更不堪問了。所以，青年們要趕快覺悟，爲求新奇而得的新奇不是學問，離開社會和民族需要的，不是學問；本着民族和社會的需要而創造科學的真理和實用的發明，才是新鮮的學問。青年是可以做先知先覺者，尤其容易做後知後覺者。有了這兩種人，合起聰明才力低下的不知不覺者，共同努力，我們的民族才有繼續生存的大希望。總理把這個道理曾經反覆的說過：「天下事業的進步，

……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三種人的身上……但是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所以世界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分；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分；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分。我勸青年們都來頂受。總理這個教訓的洗禮，在三種人當中創造一部分的事業，擇定一個位置呵！

創造慾發展，是求知慾的發展，可以明白了。然而所最忌的是創造慾受支配慾和佔有慾的支配。因為創造慾如果不能勝過支配慾和佔有慾，其結果便是個人聰明才力，不以服務社會為目的，而以奪取為目的。要打破這種個人主義，唯有提高革命的人生觀。劉蘆隱同志在他起草的國民黨的宣傳方略上對於革命者的人生觀有一段話，大意是說：『革命者必須這樣認識自己：一切都不是我的，有身體是社會的，不是我的；智識是社會的，不是我的；我生時不是我要生的，我死時不是我要死的；一』

一切都本來不是我的，我的智識是因社會而有，我的才力是因社會而用；所以要打破我的一切所有，才能成就社會的一切所需。」這話真是能夠表現三民主義者的革命人生觀，然而同時也是今日青年應有的人生觀。因為要有這樣的人生觀的人，才能破一切造成個人主義的私慾，而發展為社會和人類謀公共福利的創造慾。在我們革命者今日所負的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責任上，總理已告訴我們，先知先覺者要有一分，後知後覺者要有一分，不知不覺者也要有一分。全民族的人既然都負一分責任，那就在這一個總合的負責救國負責建國的工作當中，還容得個人主義的存在嗎？

然而同時也要知道，三民主義者提倡創造慾之發展，而打破個人主義，並不是對於支配慾佔有慾和性愛慾持禁慾主義，而實是把後面這三種慾通過創造慾的展進之路，而獲得正當的擴大和實現。三民主義，我視為可以稱之為唯民主義。民族主義之目的在民有；民權主義之目的在民治；民生主義之目的在民享。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全民一切慾望的總擴大和總實現。個人主義的禁慾固夠不上說到這一個大目的；就是個人主義的縱慾，也倒會破壞這一個大目的。唯有三民主義，對個人主張把一切慾歸到創造慾的發展上面，或把一切慾調理到不妨礙革命工作的限度，然後人人都能對實現

三民主義總目的各負一部分創造的責任，三民主義實現了，則全民族的生存目的也達到了。這樣，就可以說得是：以個人的創造慾，去滿足全民的生存慾，全民生存慾滿足，則其所滿足的，就中自然有個人的慾望的滿足。青年們只要過細把三民主義研究貫通，就曉得三民主義的社會，人人是有權的，人人是各因其才能而有用的，人人是衣食住行四項需要都有着落的。這樣一個新社會，還愁有人生的煩悶麼？

要實現這種新社會，青年們就要知道努力的方法。禁慾主義教人只管讀書，不管革命；縱慾主義驅人只管革命，不要讀書。這都是大錯。總理說：『除了革命，沒有學問；』又說：『革命的基礎，在深厚的學問。』凡是有志的青年，都應該在這個教訓之下來努力，才不至走錯路。因為要在這個教訓之下，我們才曉得革命和求學是並不相妨的，而且在中國尤其是要同時並行的。青年當中往往有句錯誤的話，就是做了事就不能讀書，讀着書就不能做事。對於這一個錯誤指摘得最透澈的，有朱執信先生『讀書與做事』一文，希望一般青年去過細讀讀那篇文，一定可以受到很深的感動。總理一生，就是我們大家的模範。他除了革命就是讀書；無論在軍中，舟中，車中，只要一得空，就拿着大本的書，一頁

一頁的看。無論任何青年人的生活，難道還有比 總理繁忙的嗎？總理一面做事，一面讀書，而許多青年說做了事，就不能讀書，豈不是自欺欺人？所以青年努力的方法，應該是讀書與做事並重，這是第一點。做事，現在最重大的就要做革命的事；求學，就要求革命的學問。革命的學問就是一切能增加我們革命能率的學問。不能增加革命效率的，和那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的學問，是不要去學的，免得消耗我們一分有益於革命的光陰。所以 總理說：『革命以外，沒有學問。』但是他又怕我們誤解革命就是片面破壞的事，所以又告訴我們說：『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這就是說破壞是為建設而始破壞的，學問是為建設而求的。沒有高深學問，三民主義怎樣能夠實行呢？所以，求學是為要增加革命的效能，其意就在此。這是第二點。在三民主義的建設上，最需要的學問是科學。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沒有一項計畫或理論是沒有科學在裏面的。青年要負得起建國的責任，決不能像以前讀死書而可以擔當得起的。世界上唯美國的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的教育最普及，但是它的社會科學教育却沒有進步。所以有人批評美國是跛行的教育。我們中國向來求學的趨勢，却正與美國相反；偏重於社會政治文學哲學一類，而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却只有退步。美國教育是跛行，而中國教育直

是斷了一個足。我們以後補偏救弊，直當以東方民族的革命精神去求美國的科學知識。這是青年努力所應注意的第二點。

總結說來，青年的煩悶問題，並不在慾望不遂，而在不知所以遂慾之道。只爲求遂慾，必至犧牲，以殉慾；所以縱慾主義，不特不是遂慾，並且不能遂生。反之，只爲防身以制慾，少數人或不失爲獨善，而大多數必至益禁慾而慾益橫決；所以禁慾主義終必爲縱慾主義所乘。爲個人之生以遂慾，不如爲全社會之生以遂生；爲全社會之生以遂生，便當發展個人的創造慾，求社會生存能力的增加。增加社會生存能力，是全社會分子個人的責任，而不只是少數人的責任。人人依其聰明才力的高下而服社會之務，就是社會生存能力增加的唯一之路。青年應從增加社會生存能力的路上前進。以個人創造慾，充實社會的生存，便是青年們得着慾望的協調，生命的擴大。但是社會的生存之充實，必待科學的發展。有科學，纔能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在這四種努力當中，才見着青年們條條都是生機蓬勃的出路！

##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

### 一、一般的觀察

民衆運動，在中國已由多年實際的試驗時期進到理論的確立時期。經過多年試驗的行程當中，我們應該把民衆運動一般現象作一個總觀察，從觀察當中，估定它的內容和價值。

先就它的一般現象說，我們知道凡是民衆運動，其起因總是由於社會的大變或國家的危亡。民族間戰爭的失敗，外人的欺凌屠殺，軍閥官僚的賣國殃民，少數特權者的荼毒壓迫，都是直接製造民衆運動的原料。沒有這種種原料，民衆運動的火線是燃燒不起來的，縱燃燒也不長久，以不普遍。在中國，軍閥的迭起，帝國主義者的相繼掠奪，續續供給我們民衆以運動的燃料，而我們的民衆運動因之，也有備具永久性的可能。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民衆運動是最富於狂熱性的，其所感受的刺激大，其所發的刺激亦大。巨風怒雨，固然發了天地間不平之氣，然狂暴的傾向，也隨着而來。所以凡是個人批評的理性，一到羣衆的狂熱裏面，就最不容易表現，而反常的行動，往往隨狂熱與俱進。這種民衆運

動的現象，便引起了世人兩種的批評：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富危險性的，是不應該有的；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有力量的，最能促進社會的改造的；前者是法國心理學家呂邦的態度；後者是革命者的態度。但是社會不能免避罪惡，不能保證不遭受危險，則民衆運動自不能保其不發生。所以問題並不在民衆運動是否應該有，而在如何使民衆運動成爲有益於社會生存的利器。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點。民衆運動，結果往往歸於失敗，歷史上這種例很不少，而且失敗的結果，往往引起社會民氣若干時的消沉。究其失敗的原因，不外幾種。如果是由於目標太多，或問題太複雜，則民衆到了認清一個總的最大目標，或找出許多問題的一個中心問題的時候，還會運動起來。如果失敗是由於民衆運動當中起了野心家，那末民衆不久必將轉移他們的目標，向着野心家掙擊。如果失敗的原因，在於敵方的壓迫太強大，那末民衆勢力一時屈服，不久必將再起，而且再起的力量必將更大。假使失敗的原因，由於思想錯誤，方向歧謬，則民衆因失敗而受的教訓和覺悟，比什麼教育制度所生的效果還要更大而更敏捷。這是應該注意的第三點。

依第一點說，民衆運動是挽救國家危亡和保障社會生存的一個力量，是應該鼓勵的。依第二點

說，民衆運動便如何始可使之成爲有益於社會的問題。依第三點說，民衆運動，失敗和成功，都於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而我們的問題，便是要如何纔能使它成功多於失敗，及如何使它好影響多於惡影響。總括地說，民衆運動一定是以救國救社會爲目的；要保證它的成功和好影響，自然要有必需的條件。這些條件當中，第一須有不拐騙民衆的忠實領導；第二須有強固的組織；第三，須有共同的信仰。這三個重要條件完備了，民衆運動纔有不可搖撼的基礎和不可抵抗的力量。

這幾年來，在民衆運動當中奮鬥的，表面上都是一個國民黨，而暗地裏冒國民黨招牌做非國民黨工作的，却有一個共產黨，或不僅是共產黨。這種現象，便是拐騙民衆的第一義；因爲挂羊頭而賣狗肉，主義上政策上也就隨着換了內容，便是信仰上起了裂痕，這是拐騙民衆的第二義；信仰被搗亂，招牌被假冒，組織上也自然生出許多衝突而矛盾的系统，這就是拐騙民衆甚至拆散民衆的第三義。共產黨拐騙民衆的罪惡，我不要再在這裏細數，我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依這三種事實的綱領，可以更指示出一個原則來，就是：凡是民衆運動，只能以一個黨爲中心，只能以一個信仰爲目的，而且只能以一個黨一個信仰爲力量的總發動機。所謂一個信仰，須得要基於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所謂一個黨，

須得要以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爲努力的總目標。信仰統一，民衆相互利益就要由黨來企求；黨的組織統一，民衆一切組織就要以黨爲中心，而一切活動就要由黨出發，一切政策由黨透過，一切工作由黨分配。更深切地說：民衆運動，沒有以全體的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便沒有精神；沒有全體對於主義的信仰，便沒有組織的可能性；沒有組織的可能性，便沒有力量。必須先得主義，固執着信仰，集中在一個黨的組織裏面，然後民衆運動就可以把國家的權力和社會的權力打成一氣，把國家的政治機關和社會的公衆機關連成一個脈脈相通的血流；必如此，民衆運動纔可以成爲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偉力，纔可以成爲處在次殖民地苦境的中國的生力軍。

依前述的原則而批評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可得許多極有興味的觀察，而且此種觀察，很可爲前述各原則的印證。第一，共產黨的主義是不敢告人的，而其不敢告人的證明，就在於假借國民黨和民主主義的名義向民衆接觸；反面的說法，就是共產黨若不冒國民黨的招牌，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得民衆的信任；共產黨沒有東西，就是拿不出真實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來；沒有真正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而冒他人的黨和主義以騙取民衆，其原因乃在共產黨另有其不可示人

的鬼胎，而視民衆爲其鬼胎的工具。第二，共產黨是主義的寡情者，而不是策略的迷信者；牠也曉得民衆運動是起於國家社會之發生大病症，然而牠却犯着主觀病，其主觀病的沉重，乃至不問國家社會所生的是什麼病症，不求引導民衆把病症救治完好，而只一味的施用策略以造亂；國家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牠却要引帝國主義來壓迫得更甚；社會是已陷落在貧困瓦解的境地，牠却要引社會由貧困瓦解之境而趨於破產流離之境，由破產流離之境而趨於自相殘殺以至於滅亡。第三，共產黨以爲有亂子，就能激得動民衆，引民衆趨向搗亂就能革命，這樣就符合於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了，殊不知牠在事實上做起來，牠的兩大對壘的階級鬥爭便要成爲同一階級分裂爲多少職業，同一職業分裂爲多少派別，同一派別分裂爲多少小組，同一小組分裂爲多少個人，分裂愈多，鬥爭愈多；天下哪有把全個人類全個民族分拆到極點，鬥爭到極點，而可以說這是爲人類爲民族爲個人謀得幸福的革命方法呢？所以共產黨在中國活動起來，牠不但不能做兩大階級團結的鬥爭運動，並且不能做團結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鬥爭的運動；前者是證明其不能作馬克思理想中的階級鬥爭；後者是證明其不能作中國所需要的國民革命運動；二者都不能，牠還作什麼民衆運動呢？第四，證以過去的事實，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在軍閥統治之區，却沒有做着破壞工作，而在軍閥已被顛覆之區，倒盡量襲用俄國共產黨的破壞方式，這足見客觀的環境需要破壞的，牠倒不破壞，而不需要破壞的，牠却破壞到民不聊生；且因此而知共產黨所用的唯物史觀，並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乃是廣東俗話所謂「勢利」觀。——軍閥對牠不留餘地，牠倒柔順得很，國民革命軍所到之區給牠活動，牠倒搗亂起來，——結果就是需要解放的民衆却不解放，已經解放的民衆倒又被牠做了試驗品，而受盡不能忍受的苦痛，這只是叫民衆掘自己的墳墓，何嘗是爲民衆開幸福的新路？照第一個批評，共產黨是拐騙民衆的。照第二個批評，牠是施策略，將民衆做工具，還以之戕賊民衆而滅亡社會的。因爲害民衆，害社會，所以歸到第三個批評，牠不能作階級鬥爭，就連農工運動也不能作；牠不能作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連國民革命也不能作。何況牠把社會國家弄到破產大亂的時候，適足爲軍閥及帝國主義造機會，所以歸到第四個批評，牠的民衆運動，只可說是民衆掘自己墳墓的運動！

經過共產黨的試驗，中國革命的民衆，應該到了覺悟而轉向共產黨抨擊的時期。這兩年之間，中國民衆經驗了自來未曾有過的經驗，受了自來未曾受過的教訓，如果依照殘忍的唯物史觀的說法，

這許是中國民族不可忘記的教訓，然而犧牲也太大了。再檢點民衆運動的成績，可以說完全失敗。經過重大的犧牲，精神上所得的只有痛苦，物質上是毫無成績，中國民氣，目前遂有回復到從前不緊張的那樣傾向。然而共產黨、軍閥、帝國主義，中國民族生存上這三大惡魔，都正在醞釀着新形勢，計畫着壓迫中國和破壞中國的新方式，我們中國民衆是決不容鬆懈下去的。我敢堅決地說，這三大惡勢力，不破，中國民衆便一日不能不集合在三民主義之下作普遍的團結和奮鬥。三民主義本來不只是消極的爲打破這三大惡勢力而設，只是事實上正遇着這三大惡勢力的存在而猖獗，那就證明三民主義越發是打破這三大惡勢力的唯一利器。這不是誇口的說法，歷史的行程是決不會欺人的，大家且耐着心兒看吧。

## 二、舍三民主義外無民衆運動的理論

何以三民主義必定是中國民衆運動的基礎呢？這問題有兩種答案：一是從中國實際的需要上來的；一是從各國歷史的教訓上來的。爲容易明瞭起見，我們且先看各國歷史的教訓罷。

歷史是有兩面的：有縱面；有橫面。橫的一面，牠有各種民衆運動的事蹟。拿破崙的時代，在中歐各國有民族運動，在非洲有回民的宗教運動，同時在歐洲也發生經濟的鬥爭運動。到了現在，各國間的民族運動，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更是同時並起的普遍現象。這一切運動，實在都是民衆運動，因為運動之所以起，乃起於和多數民衆有關的問題，而其所有的目的，乃在解決民衆切身的苦痛。不過各國的民衆運動，有的是爲經濟鬥爭，有的是爲民權鬥爭，有的是爲反抗外力壓迫的運動，而都是各爲各的特殊問題而起，各依各的方式進行，而且各照各的預定主義而謀問題的解決，所以各種運動橫的一面沒有連屬，縱的一面沒有相同的步驟，結果往往沒有多大的成績。

從各國歷史上這種種民衆運動事實看來，無論那一個民族，它的問題，總括不外三類：一是屬於民族的問題，一是屬於民權的問題，一是屬於民生的問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所以有世界歷史的根據，所以備具了適用於世界的特長，都是爲此。然而在過去歷史上，各國對於這三類的問題，都是遇着特殊的事故發生了之後，隨時來謀解決，沒有像孫先生這樣博大的眼光和精神，能預先爲一個國家定出長治久安的大計畫來。所以各國解決這三類問題，各有各的歷史因緣，而大抵都犯了頭痛醫

頸脚痛醫脚的毛病，結果連一個大問題都沒有解決。

如果再把各國歷史縱的一面看來，我們更可以明白這三類的問題是不能各別的或任從一個來單獨的解決，同時也就可以明瞭我們的民衆運動，爲什麼要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道理。英國在歷史因緣上是首先注重民權問題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從十四世紀起，英國的民衆運動，直可以說是由貴族僧侶反抗君權之爭，到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由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到近代平民選舉權之爭。英國民衆解決民權問題的方法，就是一貫的要求一個代議制度。他們的歷史彷彿告訴我們道：只要代議制度一鞏固，民權就可逐步的解放出來；只要民權問題有了解決，其他都不是根本問題了。固然，自從代議制度成立以來，英國誠然對於什麼問題似乎都能迎刃而解了。然而英國在歷史上曾經遇着一個宗教和政治相衝突的問題，牠的代議民主制就經了百多年而找不出辦法。後來找着一個辦法，叫做『政教分離』。凡是宗教的信仰問題，任個人自由選擇，國家無法干涉，而個人就再也不必把教爭混入政爭。其實所謂『政教分離』，何嘗是什麼辦法？這不過把宗教之爭與政治之爭劈開，而宗教之爭這個問題仍還存在着。這是民權問題解決而其他問題不能解

決的一個證明。到了近代，社會經濟組織大變遷，代議民主制就更遇着困難。國會是要有大多數議員贊同一種政策，才能維持政府的，而議員却代表了許多不相同的經濟利益，要維持政府，代表各種不相同的經濟利益的議員，便不能不有種種隨時的新結合。議員一方面是和政黨有密切的關連，一方和社會經濟團體有密切的關連，他們的隨時結合，當然就是政黨間和社會經濟團體間的隨時結合。但這種種結合，又並非依照階級屬性為標準的。譬如一個主張私有財產權的農民團體，事實上遇有必要，就不能不同一個反對私有財產權的工人團體聯合起來反對一個資本家的團體；這種結合，不適合於階級經濟的理論可知。即在勞工組合當中，雖然彼此都以同樣的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而彼此間利益的衝突，往往比勞工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劇烈的多。遇着保護政策提出到國會的時候，棉紗業的工人和織布業的工人間，其鬥爭常常比棉紗工人和棉紗資本家之爭還更凶些。在這種經濟團體交相衝突的情況之下，英國的國會不啻分裂為多少經濟利益互相水火的集團，誰也不能長久地聯合誰，誰也不能長久地分裂誰，但總是合不能好好地統治全國，分不能徹底地改革社會。所謂兩黨制，雖沒有完全僵死，可是代議民主制已不復有兩個以利害感情完全相同為基礎的政黨來運用，

而有時被多少利益衝突的經濟集團所拆裂的危機。代議民主制是從前許多人認為可以解決民權問題的，而英國又是代議制的祖國；牠現在被事實證明，是以解決民權問題始，而將以不能解決經濟問題終。但是經濟問題是近代政治問題的中心，經濟問題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也當然不能解決。英國的民主，到了近百年來所以無進步，而只落得一個虛偽而不澈底的民主之批評，其原因就在此。英國這個歷史的例，我們就可知凡是一個國家，要想單獨解決民權問題，而同時不想解決民生問題，是決不成功的。英國歷史是從民權問題着手的歷史，現在牠却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問題，而且不能澈底解決民權問題，這豈非民權問題和民生問題有連鎖關係的最大史例麼？

其次，有的國家，其歷史的發展，並非沿着一條解決民權問題的線索而來的，換言之，就是沒有民權發達史的因緣，而一到現在工業發達的時候，各種經濟團體的鬥爭便成了國家的最大問題。與國就是這種國家的一個最好的例證。與國各種經濟團體是有組織的，所以牠的民衆運動，顯著地是經濟的鬥爭運動。國中各種經濟團體的力量，是勢均力敵的，而在政爭上也就各不相讓。不消說，與國民的政治生活，就是利害不同的經濟團體有組織的長期鬥爭。這種鬥爭，不但資本公司與資本家爭，並

且勞動者與勞動者爭。因為經濟團體的分野，事實上並非依階級的差別而分，乃依各項工業相互的利害衝突而分，所以表現在政治上的分野，就更加複雜。一個經濟團體的主張和政策，不能強其他團體的贊同，國家就因之長在各團體相持不下之中，而陷於僵化的政局裏面。這種國家，當然是沒有敏活的進步，所以在國際上尤其要受英法意和國際聯盟的支配了。這一個例，就可以證明凡是一個國家，若任經濟的行程自然發展，到了階級之間不但有衝突，而且同一階級同一職業之間也有衝突的時候，不獨民生問題是不能解決，就是民族問題也無法解決；可知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也是互相連帶的，要解決這個，就決不能拋棄那個。

站在歷史的總樞紐上觀察現在的世界，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如果單獨把權給與人民，把富給與幾個資本案，這種國家是不能稱為民主的；一個國家，把富和權都只給與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却一無所有，這種國家是決不能存在的；如果少數國家，對內把政治不平和經濟不平的爭端解決，對外却強人忍受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的壓迫，這種國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罪人。現在的世界現象，正是如此，可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今日世界的三個連環問題。將這三個連環的問題縮小到一

個人的生存上說，就是人不能有財產而無自治權，也不能有自治權而無財產權，更不能有自治權和財產權就自視若天之驕子，而施壓迫於他人。倡無治主義者，理想在於破個人之被治，而心裏何嘗否認個人之自治；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者，理想在於破除支配他人之財產，而心裏亦何嘗否認各民族之自治？苟明此義，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實人類全體的問題，也就是個人的切身問題。在這三大問題不能同時解決的社會當中，個人便都有發起或參加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的必要！

這是根據世界歷史的教訓所下的斷案，然而再看我們中國自己的實禍，這三個切身問題，尤其是急迫多了。孫中山先生早已和我們說過：中國民族所有的禍害，一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一是受外國政治的壓迫，一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這三種壓迫，不是僅僅一小部分中國人受的，也不是一大部分中國人受的，而是全中國人受的。全中國人切身的三個大問題，就在此。我們受外國帝國主義這三種壓迫之外，再加上民心渙散，沒有抵抗強暴的團結和能力，是自己第一種積弱；帝政遺毒，流爲軍閥，竊奪國家政權來塗炭生靈，而人民却不但沒有管理國家事業的權力，並且沒有抵抗軍閥的能

力，是自己第二種積弱；機器發明了幾百年，而我們還是生產落後，天然的富藏，自己不知享用，而任人佔取得去做吸收中國人血汗的資料，弄到一種全國皆窮的景况，是自己第三種積弱。這三種積弱是內部的，那三種壓迫是外來的。內外的禍害兩兩比合攏來，便成爲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個總問題。所以我們中國的需要是馬上就須得解決這三個總問題，否則，國要亡，種要滅，到了那時，四萬萬人是要同歸於盡，決不能倖免的。

但是我們要解決全國民衆人人有切身關係的三大問題，我們就決不能走各國歷史所走的路。照以前世界歷史所給與的教訓，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只從解決民權問題入手，而不同時解決民族和民生問題；我們更不能像與國那樣任個人資本生產制度自然的發展，結果就連社會國家都分裂成多少經濟的團體而長相衝突。我們的問題，須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在同一計畫中謀整個的解決。這就是說，我們中國民族的自救運動要有整個的解決三個問題的計畫做中心。整個的計畫是什麼，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作用，在於消滅中國外來的三種壓迫和內部的三種積弱。詳言之，民族主義，在打破外來的人口壓迫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而恢復中國民族獨立自由的地

位和權能；民權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兩種政治的掠奪，而建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政事的一個國家，使人人都有自保自養的能力和機會；民生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軍閥及其他特權者的剝削，而以國家的力量來扶植生產交通事業的發達，以滿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四大需要。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更把三民主義具體的表現出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在這三民主義的具體方案之中，孫先生完全沒有爲什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類的特權階級預留餘地，而只有純粹的爲民衆的福利打算。所以三民主義，就其作用說，實在是唯民主主義衣食住行的需要爲民而謀，政治知識和權能的需要爲民而謀，國際平等獨立地位的需要亦無不爲民而謀。我們民衆除了這三大需要而外，還有什麼更切身而更急迫的需要呢？我們四萬萬人所受的

壓迫，可以總括在一句話裏面，就是受着這三種需要的窮乏的壓迫。在這一種總壓迫之下，我們的民衆運動，當然是爲反抗這個總壓迫而奮起，而進行，而非達到目的不止。以世界各國的民衆運動的歷史比較起來說，我們的民衆不是要像英國只一貫的做了民權運動，也不是要像奧國只等到資本生產出了毛病纔來做紛亂的經濟鬥爭運動；換言之，我們做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民族運動政治運動經濟運動三種合而爲一的運動，而其所以必須合而爲一的原因，是事實上中國的地位民衆的苦痛所決定的，而非任何人空想所決定的。再比照一切民衆的原則來說，唯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備具了永久的可能性，是社會生存的唯一利器，而且是備具了成功的條件。如果真實依照三民主義目的來作民衆運動，除却一切個人的錯誤和缺點外，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決不會使民衆受欺騙而失望，決不會使信仰不一致而組織上起分裂。過去民衆運動失敗的反證，世界歷史的教訓，和國家實際的需要，在在都肯定了，唯三民主義纔是民衆運動的基礎，亦唯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纔是真切的民衆運動，無論何種阻力，都不能防止其成功。

### 三、民衆運動的三大程序

根據中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有整個解決的必要，和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的原則，我們既然明瞭民衆運動必須以三民主義爲基礎，那末民衆運動就非依據三民主義而定出整個的進行計畫不可。由此要點，遂產生一個根本原則，就是：

三民主義之實現，必須依總理手定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程序，在此三程序中，革命的政府和民衆運動必須相互的密切的聯合一致以並進；此其要義，蓋在舉國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團結爲一種大力量，而急速的完成破壞和建設雙方的工作；但在國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之間，其所賴以溝通雙方團結爲一個整個大力量者，必須忠實健全的中國國民黨，故黨必須一方爲民衆團體的訓練指導，使其能自由對於國家社會問題表現其意思，貢獻其能力，一方爲政府的監督指揮，使其扶助民衆相互的利益，其權力得爲民衆的權力，其政策得爲民衆謀福利的政策。

基此根本原則，我們且將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期內民衆運動的方針，定明其概要如左：

一、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方面用革命的武力掃除國內的障礙，黨的民衆運動一方面必須派訓練成熟的人員到各縣指導民衆，做三種主要工作：（一）協助革命的武力；（二）訓導民衆團體之組織及其發展；（三）宣傳革命的主義，和軍政時期的革命政策；

二、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爲訓政開始之時，在此時期，黨的民衆運動，必須備具大規模的計畫，爲建設的訓練，率導人民依照建國大綱的訓政實業計畫，而扶助其使用直接民權及解決民生問題的知識和能力之發達，以協助各縣自治基礎的創立；尤當注意的，就是在此期內的民衆運動，對於本省訓政基礎之確立與全國軍政統一之促進，兩種工作必須兼顧，而尤其對於民衆的訓政工作與政府的訓政方法保持密切的調協；

三、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一省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爲制定全國憲法時期，在此期內，民衆運動之目的，在於完全養成民衆運用直接民權和參預國家政權的自動能力，宣傳訓政憲政兩期內的成績，以求五權憲法和直接民權在實際

運用上收完滿的效果，同時對於民生主義的具體建設，必須使人民與政府協力共謀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之大規模的進行。

這三時期民衆運動的方針，我們更可詳細說明其內容。第一、軍政時期，民衆運動必須確立於集合全國人民的力量以掃除障礙之基礎上，故除以革命的武力奠定新國家以外交方式廢除不平等條約外，必須以政治法律的力量規定公共的度量權衡及一切法令，禁止阻礙改革的惡制度和惡風俗如釐卡陋規苛捐雜稅販賣人口等；保護民衆團體組織的自由；製定訓練民衆團體的方法；防止高利盤剝的壓迫民衆及階級鬥爭的行動；禁止引誘或脅迫民衆團體離開黨與政府的指導訓練而破壞革命之進行；確定民衆團體在地方的基本組織之完成，以植訓政時期自治的基礎，其在基本組織未臻完善以前，非得黨與政府之認可，民衆團體即不得任意組織上級機關以免奸人截斷民衆樹立民主的自治之根基而利用之以爲破壞革命的工具；而尤須解除非屬於革命武力系統之一切武裝，使民衆完全受革命的武力之保護，庶不復有共產黨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挾武裝以魚肉地方人民的危險。總括的說，軍政時期的民衆運動，在於確立民衆團體的組織，以爲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之基礎。

協助革命武力的破壞工作，而防制任何惡勢力破壞革命之展進。第二、破壞工作完成，須接着開始做建設工作，所以訓政時期的民衆運動，須養成民衆使用直接民權的知識和能力，扶植其使用科學方法以改進各階級民衆的生產，而增加其購買力，調查地方人口及農工業的實況，贊助生產和消費合作事業，測量縣市的土地，整理農田經界，以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準備，改革地方的警察衛生及農村工廠衛生等，使民衆直接享受社會生活的實際利益。故此時期民衆運動的主要目的，在培植社會的基礎，使民衆的保和養兩件大事得以鞏固而趨於發達，纔能直接進於國家大建設的憲政時期。

第三、憲政時期，民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實力已有基礎，國家就可進而實施三民主義的大計畫，如五權憲法的頒布，和實業計畫的施行等。這時候民衆運動完全要以民衆已經行使熟練的民權和已經樹立基礎的經濟能力，促進國家建設各大計畫之實施。凡土地生產力的增加，鑛產的開發，交通的建設，水力的利用，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等項大規模的公共事業，都須民衆督促政府，令國家與人民之力共同進行。總合言之，此三時期民衆運動，在第一期爲破壞惡勢力，在第二期爲確立新社會的根基，在第三期爲完成國家的建設；三者分言之必須步驟不亂，合言之必須精神一貫，而每一時期的進

行，必須民衆與政府一致，政府與民衆一致，然後民衆運動纔不失爲三民主義的運動，纔能步步取得不可磨滅的成功。

我們從這三個時期的方針和內容裏面，可以看得出中國民衆運動，決沒有適用階級鬥爭理論之餘地。我們首先看軍政時期，其革命目的，在掃除國內障礙，換言之，即掃除帝國主義軍閥和社會固有的惡制度惡習慣。這種種惡勢力是全體人民不分階級的公敵。在掃除一切惡勢力時，決不容人民分裂爲兩個對壘的階級以自相殘害，而轉爲帝國主義軍閥所乘。要曉得階級鬥爭的作用，在於把已成的資本制度的社會拆成碎片，造成大紛亂，而非集中社會的力量來革命的。我們中國的惡勢力，非資本制度從社會內部長成起來的，是一方面帝國主義由外壓迫過來和國內舊日封建社會沒落後騷亂起來的，所以中國革命所取的方式，不是把已成的社會根本搗碎，是把已碎的社會根本改造，不是把社會的力量拆散，是把社會的力量集中。階級鬥爭的社會，它的社會是反革命的，只有少數人是革命的，所以拆散社會就是革命；我們中國現在既貧且弱，生存之機日微，所以社會是革命的，只有最少數人是反革命的，所以集中社會力量，就是集中革命力量，而拆散社會力量便是反革命。因此之故，

階級革命的口號只是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實際上無產階級聯合又只是工人的聯合，而我們中國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階級革命分子聯合起來』而各階級聯合且具有整個社會結合在革命線上的趨向。我們不能一方面喊着『各階級革命分子聯合起來』一方面又把社會力量搗散，更不能一方面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一方面又叫農工陷入階級鬥爭的空途而破壞正在建設的國家。明白了這個要義，我們可以站在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的立場，把階級鬥爭的民衆運動作一個較深切的批評。

#### 四、階級鬥爭的民衆運動之批評

依階級革命的理論，只有工人可以革命，因為它們受着資本階級的壓迫。既然只有工人可以革命，所以唯有工人纔是革命的主力軍，而農民不過只能做同盟者。從這一個原則裏面，我們可以首先注意階級革命的理論，一開始已陷在一個很狹小的立場，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事實上已受了制限，——限於工人階級。既然以工人爲主力軍，以農民爲同盟者，於是民衆運動就全然依此目的進行，

換言之，舍工農運動外，便無運動了。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和列寧可謂大體是一致的，都認定農民是爲別一個階級的同盟者。然而精密地研究起來，馬克思和列寧兩人乃大不相同。馬克思的理論是：大農經營是優越的，資本一到農村，其結果與城市資本一樣，釀成兩個對壘的階級，一方是大地主之成形，一方是中農小農之瓦解或沒落。他推測客觀的事實如此，所以他對於大農主張防制，對於中農却無主張，對於小農只說是『自然會沒落』。法國馬克思派社會黨曾有保護小農的主張，而恩格斯就說：『我們對小農既不應該說促其消滅，也不要說保護他。』可知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根本上認定了中農小農是自然會沒落的，而其沒落就必定是農業自然集中在大地主手裏的結果。要防止大地主，馬克思在共產宣言裏面就提出了四個政策：（一）廢止土地私有，以地租充國費；（二）以共同計畫，改良開墾土地；（三）編成產業軍，尤其對於農業；（四）將農業工業的經營結合起來，漸次消除都市和農村的區別。從這四個政策上，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目的，乃在將農產業和工產業做到同一基礎上面，——工業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而農民都變成工人，至是都會和農村的區別也消滅了。至於列寧，他所有的對象，是俄國的特殊實情。俄國貴族就是大地主，而同時工業尙未發達，沒有西歐那種大資

本侵入農村的現象；所以他的農業政策，乃分爲三個時期：（一）在開始革命時期，主張土地農有，目的在引動農民贊助革命；（二）農民得了土地，便發生小資產階級意識，這時候就須使農民中立，換言之，就是使農民失却與工人同盟之地位；（三）到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對中農仍使之復爲工人的同盟者。這時候，蘇俄就由國家給以幫助使合作社發達於農村，引農民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之路。

馬克思和列甯不同之點在哪裏呢？就上述兩人的思想和政策說，彼此不同之點有三。第一，馬克思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和列甯所謂農民階級同盟有別。蘇俄的農民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在一起，對帝制和資本階級作戰，因無產階級革命而得土地和自由，所以牠是做無產階級預備軍的農民階級。列甯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就是做無產階級的預備軍。這一種農民階級，和馬克思所指的在西歐資產階級革命之間，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聯合在一起作戰，從資產階級而得土地，做資產階級預備軍的農民階級，當然是大不相同。馬克思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就是客觀事實上認定農民階級做了資產階級的預備軍，而農業之發達，一定是大資本侵入農村，大地主之成形，和中小農階級之沒落。第二，蘇俄的農業和西歐的農業，也有區別。在西歐，農業發達，是依資本主義通常的軌道，一方面是巨大的地

主和資本主義的巨大地主，一方面是在貧困窮乏及所謂賃銀奴隸極顯著的分化種種關係之下，完成所有的農業。馬克思以這種事實做背景，所以他推斷農民階級衰頹沒落，全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蘇俄的事情却不同，農業因蘇維埃政權成立，和重要生產方法之國有化，阻止了西歐這樣的發達，所以就不得不另闢途徑。所謂另闢途徑的方法，就是列寧的合作計畫。史丹林在他去年出版的『列寧主義是什麼』一書裏面，曾扼要的說明他的合作計畫之目的：『幾百萬中小農民的合作組織，由國家給之以有利的信用而得以支持的合作社，便發達於農村。我們的農業新途徑，乃由合作社引多數農民而趨於社會主義之建設。以集合主義的原則徐徐施諸農業，即先侵到農業的販路方面，次侵到農產的生產方面……販路的合作組織化，經濟配給的合作組織化，以及農業的信用和生產的合作組織化，是農村幸福向上的唯一途徑，從貧困零落中救出農民羣衆的惟一手段。』史丹林解釋列寧這種合作計畫，先以蘇俄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的性質為前提，以表示蘇俄合作社之性質不同於他國，遂謂列寧的合作制為合理，然而合作制不能到共產主義，列寧派自己也曾承認過的。這且不說，我們所應該注意的，還要看馬克思和列寧的農業政策的異點。第三，將列寧的政策與馬克思的比較，就曉

得馬克思以爲西歐農民階級自然會沒落，所以他的政策，意在幫助這種沒落的傾向，而消滅農村和都市的差別，而列甯則並不作如此想，所以他還極力用國家的力量，施行農業方面的合作社組織化。將這三個異點下批評，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城市資本集中和中產階級沒落的原則，事實上已經不是如此，但還說得像；至於以這一個原則推斷農村階級對壘和中小農階級沒落，現在事實上簡直說不上了，而列甯採用大規模合作組織於農業，也就是並不認定農民階級有沒落趨向的反證。然而列甯的土地農有和合作組織化的政策，一個是意在引動農民來革命，一個是意在引農民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預備軍，總言之，就是以農民爲工具罷了。

因爲馬克思和列甯的政策不同，理論上就包藏了爭點。列甯死後，托羅茨基，辛諾維耶夫，加米尼夫三人因此就和史丹林起了大爭論。托氏一派，主張估量大農的力量，課以重稅，以打消他的過剩的力量，對中農使他中立，對小農就予以幫助。史氏一派就反駁說：你們估量大農力量過大；我們對中農不只是要他中立，兼要和他同盟；對於小農，在國家力量不穀的時候，不應該去挑撥他。托氏一派，當然是懂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然而史氏一派却完全守着列甯的革命策略，並且引證列甯的三個時期

的農民政策，只是引中農爲同盟，對小農就無幫助。我們對於馬克思派和列寧派的農民政策，可以簡括的更下兩個批評：第一，農民爲工人同盟者的策略，在打破封建土地制的俄國還比較行得通，在封建土地制沒落了許久的國家，尤其在以農業生產爲主的國家，就還不設，其所以不設的緣故，就是因爲他只是政治上的策略，而非純粹爲農民幸福打算的社會政策；第二，農工同盟，如果不能朝消除都市和農村區別的方向走，或事實上不能到那種地步，則所謂『中立』同盟，簡直是爲握政權者利用操縱的代名，於農民實際毫無半點利益和進步，這是俄國現在農民的實況，在在可以證明的。

中國共產黨在兩湖所用的農民運動的政策，就更不成話。總括的說，他們是運動地痞流氓，而不運動農民，更不是農民運動。他們說是叫貧農與佃農爭鬥，佃農與自耕農爭鬥，自耕農與小地主爭鬥，小地主與中地主爭鬥，中地主與大地主爭鬥，實際就是地痞流氓把農業社會完全搗成粉碎，在這種情形之下，哪裏還有什麼界限分明的某種農民與某種農民的種種鬥爭呢？他們說是給農民以實際利益，而着手於米價的規定，初則規定『不得過二元半』，後來又規定『不得過二元』，實際則社會被搗亂，米價只會一天一天的增高，而空文的規定，是決無補於事實的，何況米價定低，其商品市價

增高，農民更是吃虧不小呢？本來農產品銷售問題，在俄國共產黨是很注意的。在十月革命前，大農受政府的徵發，而結果便是農民不願多生產。在施行新經濟政策後，蘇俄便設政府式的合作社，代農民買賣農產品，結果雖然可以稍稍增加全國農產的總量，然而事實上仍是中農小農吃虧。這些都不必說了，我們所應該注意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運動，簡直是俄國共產黨施諸中國的策略。列甯在一九二二年就老早說過，他們向歐洲進攻的五條戰線，都已失敗，唯有向中國進攻的一條戰線是有多少把握的；所謂有把握者，即看中了中國農民，可以挑動起來大搗亂。鮑羅庭一到中國，就不願有各種勞動法，不贊成合作社，而只要提出土地農有的口號，其理由都因勞動法和合作社於C P搗亂不方便，而土地農有，挑動農民棄耕作而起騷動，是於C P搗亂最利便的。布哈林現在却更明瞭中國的情形，所以就主張在中國只要提出『減租』一個口號來，就有辦法。有人反駁他說：『減租豈不是要大大的減少國家的收入嗎？』布哈林說：『對呀，國家不能減收入，農民纔好反抗國家呀！』又有人駁他說：『減了田租，工價便越增高，豈不是農民更苦麼？』布哈林說：『這都不錯，但唯其如此，就叫農民反對資本家呀！』這就可見他們的策略，是要提出極不合經濟原理的簡單口號，同是又是羣衆不

能理解但覺極合感情的，叫民衆向走不通的方向去硬撞，撞不通了便歸罪於共產黨所要打倒的國家和階級身上，好激起更擴大的騷亂來。中國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在工人當中和在農民當中，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如此。

孫總理的農業政策又是怎樣呢？概括地說，他的政策，理論是純然以農業社會主義爲原則，而具體方案是完全適合於中國的實際情形；所以他主張『平均地權』，是對於城市土地預料其地價必日見增高，而以高率的稅額及國家收買兩個方法以截斷大地主的發生，同時主張『耕者有其田』，就是對於田價必欲使其平，庶幾農民易獲安定的生活，而城市工人，自願改業者，亦可退而業農；這也就可知孫總理注重農民問題的精神了。但是，總理的政策，是要以國家的力量去幫助農民，而不是以國家的力量去搗亂農民。以國家力量幫助農民，則就中國實情而論，只要國民革命經過軍政程序，政府保障耕者有其田，並設農民銀行，以便其低利率之借助，而免土豪劣紳之高利貸，設合作社，以便其農產品之銷售，而免奸商之操縱盤剝，開發水利，以便其灌溉，而免天然之災害，資以科學知識，以利其農具之改良和肥料之利用，而促進其產額之增加，如此，農民的福利也就可以增進，哪裏用得着

共產黨搗亂的方法呢？列寧實行土地農有的政策，在原則上原亦與耕者有其田同一理想，但在策略上却全不如此，因為他目的在引動農民來革命，一方固然要打破俄國貴族的大地主。一方也要使農民來把波希維克推上政臺。等到他握了政權，他就說農民得了土地，有小資產階級意識，又把農民來挑撥拆散，使之永無反抗波希維克的力量。有人曾經批評列寧，說他『土地農有』政策，實在是違反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因為把田分給農民，就是使人各有產。列寧就說：『你却不知道取得農民在政治上若何的重要；我們失了共產主義的原理，却得了大多數的農民呀！』可知列寧式的農民運動，全然是重在政治作用，並非重在經濟理論；此與布哈林的減租革命論，同是不講經濟原則的證明。這種農民政策，目的不過為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手段，全然是利己主義，也就是害農主義，與我們總理唯民主義的農民政策，相差真不知有幾萬里程途。

依以上的批評，我們就明瞭共產黨和國民黨民衆運動的區別了。共產黨的農工羣衆運動，顯然是為C P爭奪政權的工具，而國民黨的民衆運動，在農工兩方面，都是要造成全國的經濟組織之發展。我們總要從毫無健全社會組織的紛亂國家裏，把民衆引上三民主義之路，經過軍政訓政憲政

三個程序，使民衆由社會組織化，進而爲政治的自治組織化，由政治的自治組織化，進而爲經濟的組織化，乃至使民衆組織同時備具社會政治經濟三種性質的基礎，中國纔有鞏固發達的希望。總結的說來，三民主義是唯民主義，民衆運動是要三民主義自實現的，共產黨沒有真實爲民衆而謀的主義，只有奪取政權的策略，它的民衆運動是要拿民衆做工具，而爲它奪取政權的犧牲品的。唯民主義的革命，是革命黨自己犧牲去換取革命的成功，而以利益付之民衆；共產黨的革命，是要引動民衆去犧牲，換取革命成功的利益，是要歸之共產黨的。共產黨的革命成功，只有黨是成功，而民衆是犧牲了一部分，所剩的一部分，縮使大亂之餘能夠共一點現成的產，也是有限。國民黨的革命成了功，黨的損失必大，然而民衆却能站起來行使自己的權能，同在三民主義下獲得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利益，而其所獲的利益，是創造新的，不是瓜分現有的。有人曾經批評過俄國共產主義說：『現有的經濟的生產，就是收到國家手裏來重新分配，縱使分得平均，人民也所得無幾，必須要從新造產來分配，人民纔所得無窮。』所以孫總理說他的民生主義是遺產的，『是要共將來，不是要共現在，』其所含的真理，實不僅僅施之於中國實際情況而適合，乃放之世界而皆準的。由此一義，也就可以區別。

共產黨的民衆運動，是困在現狀裏面混戰的，而國民黨的民衆運動，是引向未來新社會創造的。中國革命的民衆，努力向三民主義的創造之路來啊！

## 不要上C P的當

黃埔同學改組委員會成立演講

我們在革命的立場上，對於一個主義，就是本黨的主義，必定要認識得非常清楚，必定要有非常深刻的信仰。既已認識與信仰了，然後便要盡力的去實現他。凡是我們同志，不但積極為革命起見，就是消極為自衛起見，也非要如此不可。譬如黃埔學生對於本黨的主義，如果認識不十分清楚，信仰不十分堅確，實行不十分盡力，那末，馬上就要失敗，人家馬上有隙可乘了。我想凡是一個革命黨員，對於自己的過去，應當常常檢查。而且檢查出甚麼不對來，便要立刻下很嚴重的批評，做自己日後的警戒。我們以前的種種，可以證明出我們若干的弱點。但是這些弱點，都是可以改掉，並不是改不掉的。我們從前便是有這許多弱點而沒有改掉，給人家看上了，所以才到處碰到一種搗亂的人，就是C P，來和我們為難了。現在既然提到C P，我們不妨便先就C P來隨便談談。

C P的方法，各地是一律的。他們對於不甚要緊的口號，容或隨處臨時的變更，但是他們無論到

什麼團體或機關裏去，却有一個唯一的口號，就是他們自己的信條，也可以叫做他們的政策，是永不變更的。他們說，『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工作，只有八個字。』這八個字兄弟起初也不曉得，後來到了莫斯科，到了第三國際所設的農會裏，問他們對於會務，是怎樣一個辦法，他們說，『什麼方法都是假的，惟有八個字不可不曉得，就是到中國各地工作的同志，心裏也只有這八個字。』佔領機關，爲其左派。』實行了這八個字，什麼事情都通了。』後來我回到中國，看看國內C P的進行，果然完全照這八個字的兩句，顛倒去做的。他們鑽進任何機關，初初的都作出很忠實的樣子來，等到人家同情於他們，信用他們了，他們就實行起「爲其左派」來了。究竟什麼是左派呢？大家都說不明白的多。淺近點講，比方開一個會，你說出許多正大的道理來，大家是不大要聽的，你若大聲喊『打倒什麼』，這就行了，這就是左派的作用。開會時的羣衆向來是偏向感情不重意志的。耳朵裏遇着正面的話，好像都不要緊，最中聽的是反面的話，所以喊『打倒什麼』，『殺什麼』，那就行了。能這樣喊出一個口號去，造成一種空氣，就是左派的作用，羣衆受着了，好像就不能不跟着向前似的。若問他們做出這樣的左派，究竟有什麼用呢，那就要將八個字的兩句話，倒轉來再一讀「爲其左派，佔領機關」，意思自然明白了。他

們的作用和事實，大概不外這八個字的兩句。許多人到現在還不明白，甚至於汪精衛先生還在那里說，『左派左派，夢寐以求之，』真是笑話了。當總理在北京逝世以後，汪先生回到廣州，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中，他還反對C.P.有幾個C.P.的黨員，如譚平山，于樹德等，大喊『黨要左傾』。汪先生還說，『黨無論左傾右傾，總是有傾側的意思總不妥，右傾固然不好，左傾也未見得高明。』會幾何時，就糊裏糊塗的變過去，跟着人家主張『非左不可』，『黨向左轉』，於是乎『左派』，『左派』的不絕於口，真奇怪極了。

兄弟看了俄國的情形，細按他們所有的一點成功，實在還在他們所謂右派的多。如果不相信，可以拿出俄國的革命史來看一看。如一九零五年以後俄國革命黨裏許多人承認國會是假的，教黨員不要跑進去，已在裏面的還要喊回來，叫做什麼『召還派』，這就是左派的主張。但是當時列寧獨主張不可，就是右派了。他的意思如果將這班人喊回來，便失了政治活動的地位，是算不來的。後來他的主張果然有了效果，這就是成功的在右派了。又如依馬克思主義，將來只有正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列寧說不然，一定還要農民小資產階級一齊加入，這又是右派的論調。事實上俄國的政策，果然還

是要特別注意農民，注意小資產階級的，成功剛剛又在右派了。又如那時對於德國，大家總以為是帝國主義和軍閥，非打倒不可，再沒有第二句話講的。但是德國以武力壓迫俄國時，列寧獨以為「不能以武力抵抗，他誠然是帝國主義和軍閥，無如我們本身這時不能打仗，非向帝國主義暫時妥協，先用外交手段不行。」這時布爾塞維克裏有兩派，一派說非馬上打倒德國不可，一派說不能打仗，暫時非妥協不可，主張妥協的不是右派呢。如果是右派，那末，成功又在右派了。又如土地問題，布爾塞維克本來自有方案的，但是不便實行。列寧却去採用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方案，然後布爾塞維克得以成功。社會革命黨是他們所謂右派的，用右派的方案來成功，當然就是右派的成功了。俄國右派成功的許多事實之中，尤其顯明的，要算實行「新經濟政策」一事。新經濟政策是甚麼東西呢？就是要實行共產主義時，走到不能走的地位，重新退回來的一條路。當時反對如此退却的，如布哈林，甘龍大，托羅斯基等，自然是左派了。主張如此退却的，如列寧，自然是右派了。列寧以為「革命的前進，有時候是不能一直線的，好像上山一樣，要紆回曲折的地方很多。進兩步，退一步，固屬常事，就是進一步，退兩步，有時也不能免的。」畢竟事實上俄國那時新經濟政策是不得不行的，右派於是乎又大大的成功。最近辛

諾維耶夫和史丹林之爭，還是右派勝利。他們是俄國的徒子徒孫，他們何不趕回去先打倒俄國的右派。

以上是C P利用口號的陰謀和蘇俄右派成功的情形，我們現在應該回過來談談自己了。主席剛才講，「C P到底算什麼，我們只要切實的做去，怕他甚麼。」這句話我們千萬不可忽略。中國人做事，往往開始時很高興，訂出許多章程來，條理很明，但是後來對於這種章程的遵守和運用如何呢，可就難問了。試舉一件實事做例子，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好笑，也很可歎的。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的事，是何等的重大。當時對於黨的組織定得極好。但是後來大家可曾運用得好沒有呢。組織中所謂小組，是什麼意義，如何才能把這種小組運用得好，大家知道沒有呢。大概看起來，黨員還是不知道的居多，各地區分部底下，都沒有小組，只有黃埔軍官學校裏是有的。可惜當時全黨改組的方法之中，以規定這種小組一層為最有價值，而我們嘴裏也在那裏說奉行改組以後的黨綱，但是對於這種小組，事實上却偏偏不知道注重，豈不成個買椟還珠了嗎。章程定好以後就算了，雖精采的地方也不去實行，有好章程和沒有一樣，這真是我國人的通病啊。這樣看來，C P不C P原不相干，只要我們本着自己

的黨綱，切實去做，自己是在紀律上工作的，人家如果來破壞我們的紀律，我們馬上便會覺察，馬上便加禁阻了，人家奈我們何呢。在普通一個團體裏面，黨有黨團的作用，是受黨的指揮，進行黨的工作的。同時我們絕不能容別一黨的人，跑進我們的黨裏面，做起黨團來。汪精衛先生從前說過，「C P在國民黨裏面，就如孫行者跳入豬精肚裏翻筋斗，弄金箍棒。等到豬精叫救命，纔肯跳出來。」這個譬喻，精妙絕倫。我們如果甘心做豬精到死，一切還能怪人家嗎。所以以後我們只要責問自己，應當怎樣切實的努力於自己的黨，至於C P，到底算得個甚麼呢。

我們現在不妨再借C P的一些材料，來引起我們的談話。我們曉得C P還有一句口號，所謂「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這個口號很利害。不論甚麼事，只要成功，別的甚麼都不管。那末，我們要請問他們，所謂革命，是不是為革命而革命的，所謂成功，是成的甚麼功。我們知道革命是為應合人們解放的要求，應合種族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們的要求而有的。如果無目的的搗亂，我們也說他是革命，也說他是成功，那到底要革甚麼命，成甚麼功呢。C P除了一個階級理論以外，什麼都沒有。借着無產階級的招牌，要造成自己的獨裁支配階級，「取得民衆，奪取政權，」就是他們惟一的目的，惟一的

黨義。要達他們這種目的，不問採取何種手段，不恤毀壞了中國的國民革命，破壞世界革命的戰線，尤其是把中國民族來做他們的試驗品犧牲品。這樣成功的幻想，這樣無道德的主張，真是可歎可恨呀。

還有一層，C P 惟一的主張，是無產階級革命，同時又說要有無產階級意識。我們覺得本身不是無產階級而主張爲無產階級革命，是可以的，但是何以能設如此呢。而且以別一階級分子來主張的，反而往往在無產階級本身覺悟之前，更是什麼緣故呢。所以考茨基弄到無法，不能不借重進化論的社會本能，來做唯物史觀的倫理。然而這種社會本能，究竟也隨着知識而進步，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所以無論某一國某一處的勞農運動，都是以智識階級分子來做開始領導者。智識階級分子如果離開民衆，甚至於做反動一方面的工具，那是自棄於民衆，無話可說。不過俄國與中國的 C P 却渾渾的不問理由，而提出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那麼我們要問，像馬克斯列寧等，本身都是智識階級，豈不是他們先在應被打倒之列嗎。如果把馬克斯列寧等人統統都打倒，C P 還有甚麼幹呢。東方勞動大學的學生，非 C P 或 C Y 不能進去，却有在學校兩三年，懂不到俄國話幾十句的，偶然想用於俄國

語言文字，反被嘲笑，說是想做智識階級。中山大學的校長臘德客聽見這種話，也覺得難過。這種新式愚民政策，真是無所不至啊。

我們曉得軍隊裏是絕對要重紀律的。但是軍隊中普通長官和部屬之間，僚友之間，都應相親相信。如我們黃埔學校初成立時，校訓是『親愛精誠』四個字。這種意義，算得是封建時候的倫理嗎？C對於一切道義感情，統統不用，只用一個威逼和利誘。我們只要看俄國革命史中政權的移轉，無非是張三打倒李四，李四打倒張三。起初如此，後來仍舊如此。什麼原故呢？就是因為他們在人羣之間，從來不講親愛，不以精誠相見。人羣相見以誠，才能有始有終，有道義感情相維繫，彼此團結才久。如果完全靠威逼和利誘，那末，利是一個有窮時的東西，所謂『小人之交以利，利盡而交絕』，餘剩的只有一個威逼，大家便都趨到陰賊險狠，窮兇極惡的一條路上去了。所以他們這種話，根本是不行的。不過他們要破壞我們的團體，便格外提倡這種話。他們看出誰有道義感情來，便攻擊誰，說是『革命黨不講感情，不講慈悲』。甚至於專叫下屬去搗長官的亂子，專叫學生去出先生的花樣。及至於人家的團體因此而散了，他們的私願，因此而遂了，甚麼封建思想不封建思想，再也不用提起了。

以上是C P毀滅道德、智識和情感的真相。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主張是如何。從前第三國際派代表來見總理，問總理道：『革命最初出發點是從那裏起的？』總理說：『從「愛人」起。』總理的意思以為對於人類非常之愛，不忍人類有痛苦，非設法替他解除不可，便要革命。那第三國際代表說：『我們的見解，剛剛與此相反，我們的革命是由「恨人」而起的。』單這一句話，便可以切切實實的證明國民黨同共產黨走的是絕對不同的兩條路了。單這一句話，便可以覺得我們總理精神的偉大，主義的崇高，真是舉世無與倫比的了。吳稚暉先生曾說過，俄國人攪出個C P來，因為他們的革命，太艱難了，所謂過激派，真是有激而成。現在成功還遙遙的在那裏等他們，而他們攪來攪去，總沒有結果，只弄成這種陰賊險狠，窮兇極惡的現象來。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恨人」，最讓步的說去，也要恨其所當恨。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和軍閥，是該恨的，但這種恨，也從愛人而起，才不是私憤私恨。而且愛人的固離不了感情，如果絕對不講感情，恨人的也夠不上，因為恨也是感情呀。既不能教人變成木石死灰，又不能教人明心見性，種種倫理，種種道德，不說是封建的餘毒，就說是宗法的遺傳，而自己却一味貪嗔淫殺，退回野蠻部落的思想去，這還不是開倒車麼？一個人無意識，無情感，只做恨

人的機械，這種機械式的人，是C P所希望於世界上一般人類的了。譬如中國國民黨員，在他們意中，最好通通變做這樣的機械人。一切冥頑不靈，不能自動，好聽他們指撥，做他們的試驗品或犧牲品。所以他們在我們黨內，便極力宣傳「革命不講感情」的話，用意原是如此。這些話在今天改組委員會成立會裏來講，是何用意呢？就是希望各位同學，一經此番同學會改組以後，師生同學之間，要趕緊回復從前在學校裏所有的一種感情，就是要親愛精誠，實行總理所訂的校訓，認真團結起來，鞏固我們的黨團，對於工作，更加努力，再不容黨外的人來侵犯我們，終久得到我們的成功。說到我們的成功，可不是在這會場上簡單幾句話所能明白的了。我們的成功，是三民主義的成功，我們認定中國非如此不能使民衆真正解放，我們負了這種使命，才來革命的。所以要成功我們的革命，不是求個人成功，我們要和全民衆見面，使得他們明白我們國民黨的成功就是他們的成功，就是全國的成功，這一點是非常要緊的。我們的手段，不同C P的一味想佔領機關，但是我們也要從一樣一樣的工作做起。某部分的工作做好，便是某一項的使命達到。我們要把全國的革命勢力集合起來去做，也就是要把全國民衆一致聯絡起來做。我們在中國是最負責任，最有計劃的份子了，假如我們自己還受民衆懷疑，

猜忌，不相信，那我們還革什麼命呢。

我們黃埔同學中，已有多少先烈犧牲掉了。留下了我們後死的若干人，應該怎樣的努力，才能夠對得起先烈諸同志。從前有人叫我們不講感情，但是我們黃埔同學，生就的是最親愛，最富感情的。對於目前的同學，感情固重，對於已死的同學，感情尤重。有人想拆散我們，去達他們的目的，但以我們情同生死，義重如山的黃埔同學，今後團體的聯合，是何等的鞏固，還會教任何的人，分拆開來嗎。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

二四

## 不要讓C P搗亂國民革命

四月十八日在首都閱兵演講

今天我們繼承 總理的遺志，恢復 總理手創的國民黨權，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日子。我們在黨的使命上，在過去整年的軍事戰績上，在目前國民的工作上，乃至在將來國民政府所負一切重大責任上，不能不從今天起，更加認識恢復黨權和統一指揮的重大意義。現在我們苦戰萬數千里的武裝同志，耳裏一方聽武漢中國共產分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一方聽到各省同時並起的擁護蔣總司令的呼聲，當然可以辨別清楚，由武漢來的口號，是少數人製造出來的惡聲，而各省的擁護蔣介石，確是革命的民衆的普遍要求。我們要曉得共產黨的倒蔣，與各省革命民衆的擁護蔣，實是有同樣的重大意義。因為共產黨所要倒的不是個人，是要搗亂我們的黨，破壞我們的國民革命。我們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所要擁護的也不是個人，是要擁護我們的黨，幫助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人攻擊蔣總司令的口號，是打倒獨裁，然而在事實上蔣總司令是不是獨裁呢，不是的。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

之日起，蔣總司令的權，是黨所付與的。本黨把軍權給了我們一個忠實的能革命的同志，他就是在黨的指揮監督之下的。他唯有奉行黨的命令，執行討賊平亂的職權。他既然是奉黨的命令來北伐，還有獨裁的可能嗎？這可見在今日以前，蔣介石同志並無獨裁的職權。到了現在，我們還知道蔣介石同志自己曾提議把軍政和軍令分開，這尤其見得介石同志不是一個要獨裁的人。大家知道，在北伐軍克復贛閩之後，餉械的接濟，完全受武漢共產黨人的牽制，經我們武裝同志羅雀掘鼠的籌措起來，才能出兵，才能平定東南。他們共產黨人倒用了獨裁式的手段，來阻礙北伐的進行，他們倒不知從何種機關，取得了任意扣餉扣械的權，來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計，反而要說我們武裝同志的總司令是獨裁，這豈不是千古奇談。

從這種事實上面，我們可以證明武漢共產份子實不願國民革命成功的。他們的策略，是要把我們最堅強最革命的中心攻破。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有堅強的革命軍不可，非有忠勇的總司令不可。要使革命軍的能力可以摧銳攻堅，非有強大的黨不可。他們知道我們的黨是強大的，革命軍的能力是堅強的，革命軍的總司令是忠勇的，所以他們要摧殘我們的黨，首先就謀破壞革命軍的榮譽。

他們要破壞革命軍的榮譽，首先就要詆毀革命軍的領袖。因此，他們便造謠，說總司令是獨裁。他們這一個口號的作用，是有兩層的：頭一層，是想搖動一般革命的民衆對於我們武裝同志的信仰；第二層，是想拆散我們國民革命軍陣線以內團結的力量，使我們軍事上不能統一指揮，不能一致作戰。我們武裝同志都認識軍事上是要號令統一的，要指揮集中的，要依照總部的作戰計畫分工合作的。尤其要在軍制系統之下表現嚴整的紀律出來，使全部革命軍的力量充實發展的。但是共產黨人的搗亂，就是要拿「獨裁」的口號來煽惑我們的軍心，使全體武裝同志對於號令統一上發生疑慮，對於紀律上生出渙散鬆懈的破綻，因之我們國民革命軍的指揮力量也就要發生變化，作戰的能力也就要減少，那末他們共產黨人就可乘機來說我們國民革命軍不行，進而將國民革命軍打倒，另外換出他們所要的一個什麼軍隊旗幟來，那才算達了他們的目的。所以我們武裝同志，要認識他們「打倒獨裁」這個口號的深遠的意義，要了解他們並不是攻擊蔣介石同志個人，而是要想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全部。我們武裝同志以及非武裝同志，都要識破他們這一類口號的用意，不要中了他們的毒計，讓他們來暗笑我們革命同志的不中用。

他們搗亂國民革命的第二個口號，就是『打倒新軍閥』。我們要曉得軍閥是無所謂新舊的。一個軍人，上沒有爲國家的利益，下沒有聽民衆要求解放的呼聲，只是前面靠着官僚政客，土豪劣紳，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做了虎狼，後面勾結着帝國主義做了聲援，這就是軍閥。他無論在何種時代，無論在何種國家，都是軍閥，那能替他分別什麼新舊。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軍閥，而不問其新舊。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新軍閥』這個口號，可見他們所要打倒的並不是軍閥，而是另有所指的。所以我們在他們這一個口號上面，可以認識他們已經離開了我們革命者的立場，拋開了軍閥不倒，而叫人去打倒，他們另有所指的人。我們暫且不問其另有所指的人爲誰，但就其立場而論，他們已成反革命。他們這一個口吻，正是脫胎於他們素來用以破壞國民黨的所謂『左派』與『新右派』的口號。他們要破壞國民黨，就把整個的國民黨來煽動，分出那一部分人是右派，那一部分人是左派。過了多少時，又分出那一部分人是新左派，那一部分人是新右派。本來在各國議會當中，國會本身是屬於幾個不同的政黨的議員所構成的，其分成左右派是無所謂的。但是國民黨却不是一個國會，無所謂左右派。國民黨是整個的革命黨，如果有人要來把它分開成爲什麼左右派，那就是破壞我們整個的革

命黨，就是反革命。中國共產黨的策略，就是反革命的策略。它是想分開了我們整個的黨，拿住我們的一部分同志，叫他們爲左派，來打我們的。他一部分同志，說他們是右派，等到它把我們的一部分同志打倒了，它於是更把我們剩下來的同志，就是它所謂的左派的，再分了一部分出來，說他是新右派，又非打倒不可。它這樣的分了再打，打了再分，結果就是原來整個的國民黨，給它分到不能再分，打到不能再打，而担負革命事業的國民黨也就要告終，國民革命也就要中斷了。這種策略，不是反革命的是什麼。兄弟在俄國的時候，接見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不少，他們所問我的問題，我都能答覆到使他們滿意，我做的文字，在俄國各大城市的報紙發表的都不下十幾萬言，但是有一回和日本共產黨領袖之一的片山潛談話，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就實在無法可答。他說：『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分左右派，你們有兩個人在一起就要分左右，分到剩了一個人還要分左右手，難道左右手也要撞起來，連一個人都要撞完麼？』我聽了這句話，我真是欲哭無淚了，教我如何能夠回答他。武裝同志，我們國民黨的左右是我們自己分的，還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分的呢。我們的黨是革命的，我們的黨員是革命的，我們的革命軍尤其是革命的，我們是整個的革命力量。我們之所以不能任人分割，猶之乎我們的肚皮裏頭

不能給人家跨進來跨出去。中國共產黨對於我們革命的力量，用種種方法來破壞，而且破壞的方法多得很，其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把國民黨拆開來，跨進去，拿了我們一部分人，又跨出來，彷彿軍隊裏面的一師團，給人家另外一支軍隊插了一部分人進來，在你這師團裏面來挑撥煽動，而他們却另有指揮，另有結合，另有作用，另有羽翼，你這一師團還能出外去對敵人作戰麼。當然不能的。現在中國共產黨用這種方法破壞我們的黨，還要破壞我們的革命軍。它之分拆我們的黨，阻撓我們的北伐，煽惑我們的軍心，污蔑我們革命軍的領袖，這都是一條線的破壞國民革命之詭計。我們既認識了它的詭計，那末什麼『打倒獨裁』、『打倒新軍閥』的話，其中作用，就都不能逃出我們的燭照。我們都已經知道，所謂『獨裁』，所謂『新軍閥』，拿來映射革命軍的領袖，是失了效力了。全國的民衆，尤其是革命的民衆，現在都認識中國共產黨的背後，和武漢反動派的背後，現露一個獨裁出來了。同時，全國民衆也認識革命軍領袖之上是有國民黨的，國民黨是不容易被人家跨進跨出的，尤其是武裝的革命同志，是不許奸人任意來煽惑欺騙，任意來污蔑他們的領袖的。即如他們說革命軍的領袖是『新軍閥』，武裝同志們，你們自己親眼看得見，你們的領袖背後有帝國主義做聲援沒有呢，沒有的。你們的領袖，前

面拿了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虎狼沒有呢，也沒有的。你們的領袖，既然前無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虎狼，後無帝國主義做聲援，那你們的領袖就斷然的是革命的領袖，這是不容懷疑的了。你們的領袖，既然沒有做軍閥的條件，那就證明了不獨不是軍閥，而且確是革命的領袖。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民衆的利益，所以不能實現出來，是由於我們民衆的利益，被帝國主義的利益，被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的利益，重重的壓了下去，你們的領袖，不但沒有帝國主義，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羽翼，並且正要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這一類的惡勢力。打倒了這一類的惡勢力，民衆的利益，始得因去了重重的壓迫而表現出來。因此，也就知道你們的革命領袖之所以奮鬥，是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如果你們不相信你們的領袖是爲民衆利益而奮鬥的，那末，你們可以反問自己，你們是否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如果你們自信是爲民衆利益來革命的，那你們的領袖縱然想不爲民衆利益而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武裝同志們，你們要信賴自己是革命的。要充實你們的革命性，成爲一個堅強偉大而不可抗的力量。有了這種不可抗的力量，那你們的革命領袖的力量，就越發能夠擴大。國民革命是需要絕大力

量的。爲國民革命，我們要和各省革命的民衆團結做一個精神和力量。既要和各省革命的民衆團結爲一個精神和力量，我們就要擁護革命軍的領袖，鞏固革命的陣線。國民革命軍和革命民衆團結起來！

## C P 的手段和策略

任全國學總大會演講

### (一) 共產黨誘惑青年的手段

諸位要曉得，共產黨擾害社會，他們自己有三個口號：就是佔領機關，奪取政權，和奪取民衆。他們有時還栽謣我們有什麼不好的口號，其實他們有三個口號在那裏爲惡的，確是真的。我國一班青年，著了他們的迷惑，以後便以爲這三句口號是最革命的方法；並且本黨有許多老黨員，聽見這三句口號，也得驚爲未曾有的成功秘訣（？），跟隨着去做，真是可嘆極了！用這三句口號的人，看見某一機關有號召人的力量，有利用的價值，就馬上便千方百計的去佔領他，利用他；學生總會，乃一有力量的團體，足以號召青年的機關，他們當然非佔領不可，佔領農會一樣；也猶如他們要佔領武漢，佔領兩湖，好設立僞中央僞政府一樣。但是他們究竟用甚麼方法去佔領學生會？學生會如何便被他們所佔領呢？原來他們佔領機關的方法，無非兩種：不是「巧偷」，便是「豪奪」。他們有勢力可施，可以硬行壓迫。

下來的，就採取豪奪的手段；不然，使用詭謀暗算，旁敲側擊的方法去巧偷。我們只要看他們占領學生會的情形，就可明白了。他們或用金錢去誘惑青年，聽他們的驅使；或假借口號，說革命總要向左，如果不勇於作惡，不勇於無恥，不勇於做下等的事，便是思想落後；或造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論，來束縛人的思想。把他們種種的方法總括起來，可以知道他們誘惑青年的手段，不外三種：

第一，用口號來煽動青年的感情。

第二，用金錢和虛榮來墮落青年的意志。

第三，用邪說來麻醉青年的思想。

而青年在新奇慾，支配慾，占有慾三種之外，還有一種狠利害的性慾，時時在那裏作怪，剛巧我國的舊禮教又是一直逆著青年的生理，心理，主張禁慾的，他們得到這樣的機會，把青年的性慾，簡直看做無上的工具了！他們利用青年性慾，去誘惑青年的方式甚多，戴季陶先生前兩年在『告國民黨與中國革命』一書中，已憤憤不平的說了些他們的內幕。他們常以青年的戀愛為要挾，譬如他們看了甲，一定要他做CY才好利用他，他如不肯就範圍，而又剛好是有戀人的，他們便找出乙來去攪他

的戀人，並且聲明，你如果依從了我們，便還你的戀人；不然，你就老實預備失戀吧。曾經有一位青年向戴先生訴過苦說，我因為某種關係，不得不服從他們了。如果是女戀人，他們便找男的去攪；如果是男戀人，他們便找女的去攪。在上海大學，他們還是小試其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裏，他們簡直宣言他們不但解決了許多革命問題，而且同時解決了許多戀愛問題哩。

這樣看來，他們不是以青年的性慾為招徠，C Y的惟一無二的工具嗎？他們這些舉動，和他們向來所喊的一句口號是很合的。他們說，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他們祇要達到利用青年的目的，至於怎樣去使青年就範才為正當，却全然不在打算之中。所以他們既看中了學生會，要利用這個團體，便無所不用其極的設法佔領，設法利用，至於學生會既被佔領以後，既被利用以後，還成個甚麼學生，還成個甚麼會？他們可老實不客氣的一點不負責任了！

有人說，目的神聖其手段，目的和手段，未常不可分開。如果目的是好的，使用個壞手段去求達他，也不妨。這句話實在不對，手段和目的是有密切關係的，手段最能影響目的，不是某種手段，往往就不是某種目的了。譬如一個人目的在求一個妻子，而用的手段，却是『踰東家牆而撲其處子』，豈不是

起初就決定以專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以爲妻做一個目的麼？那末，事實上做起來，儘管去踰牆而摸好了，毋庸再顧慮到手段的對不對了。不過這一個目的究竟如何，却又不可不問問，究竟踰牆去摸人家的處子以爲妻，是正當目的，不是正當目的呢？如果用的手段純是反革命的，而口裏儘管說革命，希圖蒙騙他人，已經不是不擇手段這一類的話所能抵賴；何況他們的目的，顯而易見，像C P那樣的反革命，他們何嘗革甚麼命，又何嘗成甚麼功呢？

## (二) 共產黨是只有策略沒有主義的

如會談到主義，可就更難說了。馬克斯主義如何？列寧主義如何在這班共產黨的行動中，是從來看不出來的。他們實在祇講政策，沒有主義！談到主義，他們就遮遮掩掩的不願意示人以明白了。他們對於真正的主義，有時候也看做政策。考茨基替馬克斯主義下定義，就說『馬克斯主義者，乃社會民主黨之戰術與策略也。』史單林自認爲列寧主義的嫡派，也說『列寧主義者，乃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與戰術也。』足見他們實在沒有主義，只有策略，和我們有三民主義，就宣傳三民主義，就實行三民主

義的大大不同了。

我在俄國，有一次集會，他們掛了一個標語，是從孫文主義到列寧主義，我大不謂然，便大膽的說：『這個不對，一定要倒過來說，從列寧主義到孫文主義才對，因為列寧主義，不過是三民主義當中心一部分的政策而已。』我說這話，並不是對他們鬥氣，我實在有精確的理由，所以他們也無話駁我，後來便把這條標語抽去了。中國的共黨造謠言，特別提出來說：『總理有三大政策，非擁護不可，我們很覺奇怪。』就說：『總理有此三大政策，也是從三民主義裏面出來的，應該就包含在三民主義裏說，何能將三大政策特別提出來和三民主義並列呢？』總理是有主義的，講任何的話，都有主義做根源。那裏像他們那樣專講政策的，會弄錯了將政策看的和主義一樣重呢？這又是他們專談政策不談主義的一個明證了。

### (三) 馬克斯的缺點和列寧

我以為馬克斯爲人，尚不失其爲學者。第一，他不狡辯，他是富有研究性者；第二，他有相當的好心，

他甚安分，不肯亂攪。他後來因做萊因新聞主筆和人家爭論土地經濟問題，攪不明白他就退居書齋，悉心研究去了。他又曾評論槐特林格祇會煽動，并無科學的基礎。他未遇巴黎公社發見以前，他不敢爲無產階級專政做麼什麼提案。一八七二年馬克斯在勞動國際會議會說：假如說達到此目標無論何處要取同一的途徑，這不是我們的主張，我們非考察各國民的制度風俗習慣不可，例如在英美兩國——荷蘭也可以說在內——可以用平和手段來達這個目的，但不能說各國都是同樣的。這是研究馬克斯生平應當注意的。至於列寧可就不然了，列寧專講搗亂破壞，別樣一概不管。

廖仲愷先生說過：『馬克斯是個學者，列寧是個大縱橫家。』實在確當之至！凡是列寧的一派，總不主張人研究學問，這一層我們祇要聽他們打倒階級的一個口號，就可以明白了。在俄國東方勞動大學裏留學幾年的，連俄文都沒有學會；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連唯物史觀都學不到，如果要學要研究，就說你是想做知識階級，不想革命，思想落後；你如果不去學，祇管跟他們亂攪，就送你一頂向左的高帽子，就合他們的口胃了。所以C P固然不要什麼有氣節的人，也絕對不要有什麼學識的人，他們最要富有煽動性的人，他們從來沒有什麼計畫，說培養一班具有某種學術某種經驗的青年，去負革

命責任，祇要能做他們工具的就是好青年，就是革命人才了。有一次我去看史單林，他說：『學生中能革命的莫過於中國的學生。』我說：『學生都是青年居多，所以都富有革命性，而中國整個民族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急求解放，其革命思想就表現於學生。』他也很以為然。後來我更對他們說，當我們總理開創革命事業的時候，就以青年為領導，朱邱陳不都是青年嗎？刺德壽的史堅如不也是青年嗎？你們既然知道青年是革命份子的中堅，就該訓練他們成為領袖的人才，纔好去領導民衆，何能喊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教大家變成愚蒙，教革命份子中的領導人才從此中斷，乃至於絕滅呢？我這樣指出他們思想中的矛盾地方，他們也無辭以對了！

#### (四) 打倒知識階級一個口號的來歷和誤用

說起『打倒知識階級』這個口號的應用，本來就出於誤會，俄國革命當初純是知識階級幹的，不過他們沒有精密的組織，也沒有喚起民衆，後來革命學說的各派，紛爭甚烈，莫斯科的無產階級，較前增多了，蒲列罕諾夫便跑到第二國際去報告，指這班有知識的人說：『俄國的知識階級現在不革

命了，他們是離開民衆的。」他的意思，是要運動了工人，才算有民衆，爲有民衆，便趕緊去運動工人，才算革命；這班知識階級背後沒有工人，所以是不革命的，非打倒這班不革命的知識階級不可。這個口號原是這樣發生的，用意還是專指離開民衆而不革命的知識階級而言，并非要將一切的知識階級通通打倒。後來到了列寧一派共產黨手裏，實在是怕知識階級難於壓迫，難於欺騙，所以借用這個口號去愚民，愚了民，然後才好專制一切。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他們不但要專制才如此的，簡直是要專利才如此的。他們一面要格外愚盡天下人，而一面又要格外聰明了自己，天下人既然格外愚，他們自己自然就變成格外聰明了。所以莫斯科中山大學裏，對於許多人雖不許懂俄文，而同時又專找幾個人去深究俄文，這幾個人成了知識階級以後，特殊有了一種知識，自然就特殊有一種力量，去打倒其餘想做知識階級而不得的了。總之，像共產黨這樣革命，實在是反革命，因爲既是革命，必須犧牲自己以利他人，現在他們却倒過來了，犧牲他人以利自己，那得不是反革命呢？他們不但對於知識階級這一項做出兩樣的辦法來，對別人便打倒，對自己便不打倒，就連所謂小資產階級的，也要看說話的立場如何，打倒與否，也是沒有一定的。譬如國民黨去聯絡農人，農人和國民黨站在一邊了，他們更馬上

說農人是小資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非打倒不可。如果他們共產黨去聯絡農人，想農人站在他們一邊，他們便說這種小資產階級是和工人最密切的同盟者，非擁護不可，那末你還有甚麼理論，可以和他講呢？說到階級這個東西，他們雖然只就生產機關之占領與否來做區別，但除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以外，還有甚麼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資產階級，正式無產階級，流氓無產階級等等。但是究竟甚麼叫做階級？階級的確實定義如何？從來沒有人說過，馬克斯是專說階級鬥爭的，而對於極重要的階級本身，忘却下一個定義，這一點馬氏失了科學家的態度了，實在是他一個大大的遺憾。馬克斯派的人都說是馬克斯未完的志願，馬氏本人談階級尚有這樣大的疏忽，何況他們的門徒呢？到了列寧，更利用起黑智爾的辨證法來，便不顧許多矛盾，而且正以矛盾不通為詭辨學獨得之秘了！

### (五) 共產黨最近的策略

近來有朋友從武漢來，說起共產黨現在用的是中國八股家的方法，起承轉合，遇事先衝向前去，就是『起』。有人接下去幹，或衝不出去而小作迴旋，就是『承』。形勢依然不佳，必須別尋門路，便是

『轉』了。這一轉，方向究竟轉到那裏去，可就難說得很，照常轉得極矛盾，轉到『起』與『承』的反對方面去，也未可知。如鄧演達做的是起，徐謙顧孟餘做的是承，最近某某等反共便是轉，着重自然還在最後的『合』。『起』『承』『轉』既已如此離奇變幻，將來的『合』究竟合到那裏去，自然也格外難說了。吳稚暉先生嘗痛罵過洋八股，這一種『洋八股』，更是吳先生從前罵不到，而應該大罵特罵的。這種辦法，更是脫胎於列寧進兩步退一步的辦法。列氏是學的馬克斯，馬克氏是學的黑智爾的辯證法，肯定之中，生出否定，否定之中，又生出肯定，但是無論他怎樣肯定否定，生生不已，總不過表面上做得五花八門，一時教人頭昏目眩，容易被驅入彀而已。至於革命事業畢竟是事實問題，全鬧玄虛是不行的。

### (六) 共產黨利用無產階級的眞象

我現在拿共產黨利用無產階級的眞象，再來說明一下：他們所以祇認無產階級爲革命先鋒，而認小資產階級爲反革命的，乃因無階級革命得成固好，革不成，本身亦無損失，如此最爲相宜。我從前有一次曾經和德國共產黨的領袖救德金談話，談到階級革命，他依足馬克斯的話說：第一，無產階

級無所愛惜，無所顧慮；第二，無產階級整千累萬的聚集在工廠中，一經號召，馬上全部動作起來了，農人革命絕不如工人的，就是因為他們有田產累着，而且各人有的不同，精神形式兩方面，又都分散而不團聚。我又問他像智識階級許多并無恆產的，何以不歸入無產階級呢？他說：這是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有知識，容易得到資本。我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憲法中，不是明明的說凡是運用腦力體力的，都是勞動者嗎？他說究竟這樣的人生較易，有精神上的資產，總非工廠中的工人可比。我說：照你的理論說來，無產階級雖比有產階級好，但是我想無產階級還分兩種：一種是有工的，一種是無工的。教有工的無產階級去革命革不成，有時便失了工，還不免有所愛惜，有所顧慮，最妙不過是那班既無產而又無工的朋友，所謂流氓無產階級，徹底的流氓，到地的痞棍，如果教他們去做革命的先鋒，豈不格外來得痛快嗎？他說：『事實上有時確是如此，不過理論上還不能如此主張。』我說：『你們德國現在流氓階級甚多，如果一經利用，應該革命成功得快，何以尚為理論所束縛，不痛痛快快的幹一場呢？』他說：『專造出流氓無產階級來，有時革命仍不易成，即如德國流氓果然不少，但是你若去聯絡他們，他們馬上就要求你替他解決生活問題，去謀工混錢，就難以支配他們了。本來他們是勞工的

後備軍，資產階級這時忽然出來和我們來爭，取得這班流氓，資產階級有的是錢，登時我們就失敗了，所以德國流氓無產階級雖多，始終并未利用了去促成革命。『按共產黨宣言』「貧民窟裏人們——即在社會最下層受動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也動起來，但爲其生活狀態易被反動的勢力買收。」但是俄國派去的共產黨却不是如此想法，救德金好容易一年不能回去一次，他曾狠痛心的和我們說：我好幾次把德國的民衆集收起來，又被俄國派去的共產黨搗散。他的話確是實在的情形。搗亂確是俄國派出 C P 的拿手好戲，我們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經很痛憤的對共產黨明白說過：『甚麼聯合戰線，你們從此以後，再不要提起這句傷心的話來吧，沒有你們喊這句話時，還好些，自從你們來喊聯合戰線，我們本來聯合的戰線都打破了，還說甚麼別的話呢！』共產黨的辦法根本行不通，在世界上所如輒阻，於此也就可見一斑了。

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 C P 在中國究竟幹的些甚麼？原來他們就想擴大我國的流氓階級，造起恐怖來，他們好去佔領機關，奪取政權，他們現在就做的此項工作，教中國工人無工可做，農人無田可耕，不止無產，而且無業。他們并不誠心去革命，只管如此搗亂，並擴張搗亂的份子，歸他占領，叫做

取得民衆，占了你許多地方和許多機關，消耗了你許多真正革命的力量，就攔了你革命成功的許久時期，這就是他們大大的成功了。但是現在他們又變換面目了，口號也沒有一定的了，所謂『佔領機關爲其左派』的辦法，也絕沒有從前做得那樣顯著了。一個共產黨的行動，教人決計看不出他是共產黨了。他們原想如此弄得我們防不勝防，然後他們又好暗中發展，尤其是一般青年，閱歷較淺的，他們簡直仍在那裏刻刻轉念頭，總想招致了去做工具，不肯放鬆一步，大家不可不格外留心。所以學生總會遷到首都來工作是對的，可以斷絕了他們暗中許多的妄念，不過精神方面總還要各人隨時隨地的注意，不可走入迷途。譬如國民黨員中，如今有的也多少染了C P的習氣，動輒就說有若干民衆在我的後面，殊不知民衆無論若干，都應該歸於黨，何能攔歸個人私有呢？這些地方，都是不知不覺之中中他們的毒，自己不可不曉得。他們鬼魅伎倆，說破了雖不值一錢，不過他們好像狐狸精一樣，面目甚多，我們如果絕對的信仰我們的主義，就不甯有了照妖鏡，他們的面目雖多，自然無從隱遁，真形一敗露了。諸位同學啊！從此以後，大家照我們的三民主義去讀書，去工作吧！

三 民主義者之使命

## 重要的兩個批評

六月十三日在中央黨部第三次總理紀念週報告

列寧主義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戰術、是利用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戰術

——共產黨損人利己使世界退化所以是反革命

剛才吳委員稚暉的報告中，關於共產主義既不適宜於世界今日，也不適宜於世界將來的話，說得非常確當，大家應該注意的。吳委員又用了許多妙喻，來表顯其中的道理，格外覺得透闢，大家聽了，以後再也不會忘記了。我現在要說的話，是就吳委員的意思，略做補充兩點。第一，我們的努力，要努力於革命，不能努力於搗亂。共產黨的努力，實在不是革命，不但我們以為如此，就連共產黨自己也很明白是如此的。我到俄國去，會見他們政府中的領袖，他們都這樣對我說：『你們的革命總不要再蹈我們俄國錯誤的覆轍。』這是許多人所共知共聞，不是我一個人造出來的。他們既自以為是『覆轍』，又明白勸我們不必去『蹈』，我們如果偏偏要去蹈一蹈，到底算得一回甚麼事呢。一方面在中國的

重要的兩個批評

許多共產黨，對人講起來口口聲聲都總說中國不能行共產，又說是加入國民黨，去實行國民革命，輕易不把他們自己的主張明白給人知道，好像實在拿不出來似的。至於他們的行徑，却明明白白的告訴大家，他們是在那裏搗亂，並非革命。你想，在中國的共產黨始終不公開他們的主張，在俄國的共產黨，又明白教人不要去上當，這不是連他們自己都知道，他們的主義實在不能實行，他們的努力實在是搗亂，不是革命嗎。

第二，照共產黨的種種政策看來，列寧主義實在不成其爲主義，猶如梁山泊上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一樣。不知道他們究竟所替何天，所行何道。史丹林曾說過，『列寧主義乃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戰術』，但是他們自己也承認，俄國的勞農專政，並不是真正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共產黨在那裏專政罷了。他們嘴裏雖說現在一定要讓共產黨專起政來，將來無產階級的專政才能實現，但是這句話誰敢保證呢。自從共產黨專政以來，俄國遭了莫大的殺戮，鬧了莫大的饑荒，也不知死亡了多少萬人，這就是他們要替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試問無產階級本身得着的好處，究竟在那裏。結果不過是被人利用罷了。所以我敢把史丹林對於列寧主義所下的定義改一改，『列寧主義乃利用無產階級

革命的理論與戰術。」這樣一看，列寧主義還成個甚麼主義呢。列寧的先生蒲列罕諾夫曾指斥過民意黨說，「他們只知道利用工人去解決社會問題的時機到了，不知道爲工人去革命，誠然應該，若爲了革命，才找出工人來，便大錯了。猶如禮拜日是爲工人要休息而定的，至於工人絕不是爲禮拜日應休息才有的。」爲革命才找出工人來，這種革命，明明白白是利用工人，而別有所爲，並非真爲工人的利益的，這還成個甚麼革命，成個甚麼主義呢。

在這里我可以附帶報告一事。當我到俄國去，見第三國際主席齊諾維夫時，以爲第三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總機關，不是蘇俄包辦，不是一二人所操縱利用的，對於一切弱小民族一定是大公無私推誠容納的。我就要求以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要求他將第三國際的世界革命計劃告訴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真相。我也將我們革命的計劃報告給第三國際，彼此合作。齊諾維夫和德國共產黨的領袖敦德金（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主席團之一）很以爲然，其他英法共產黨領袖都不反對，不料蘇俄共產黨的主席史丹林和布哈林却從中多方的阻撓，後來連齊諾維夫也給他們打倒了。接着我會見日本的共產黨領袖片山潛，他問我，「你們中國國民黨爲甚麼要分出左右派

來，互相攻擊呢。」我實在覺得沒有話對答他。因為左右派的花樣，明明是俄國共產黨造出來，離開我們國民黨的政策，連片山潛雖也是第三國際執行委員，都蒙在鼓裏，不會知道，豈不可歎。由此證明第三國際還是在俄國共產黨操縱之下，各國共產黨的領袖也都在俄國共產黨少數人蒙蔽之中。俄國共產黨究竟怎樣一個宰割世界，只有他們自己幾個人知道，其餘的人都被瞞過了，這是一種甚麼革命手段，是一種甚麼主義，實在莫名其妙了。像我們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是天下為公的，一切明白宣布出來，給全世界人認識研究採用，才稱得起是一種偉大的主義和革命。至於鬼鬼祟祟，不肯告人，陰險狠毒，專門搗亂破壞的，算得甚麼呢。向這樣目標去努力的，又算得是甚麼努力呢。

總之，共產黨的所謂革命，實在是反革命。我們簡單點從兩點看去，便可以知道了。第一，凡是革命都應該犧牲自己，去為他人的，他們的舉動，却都是犧牲他人，來為自己，這不是反革命是甚麼。第二，凡是革命，都是推進世界向前的，沒有個開倒車的革命，他們的行為，却明明白白是將世界向後拉，回復到野蠻混亂的時代去，不是反革命是甚麼。他們的努力，是向著他們的目的做去的，他們的目的既如此，他們越努力，世界越不了。這種努力，根本就該禁絕，還有甚麼足以誇張的呢。

## 附錄

### 鮑羅庭究竟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能力？

五月二十在總司令部演講

（前略）我們聽說武漢一方面的人，誠心誠意地受鮑羅庭的指揮，有什麼事都說「問鮑先生去，」武漢現時已弄到稀糟，究竟鮑羅庭有什麼辦法呢？我想他把武漢的民衆搗亂到極點，都做了「流氓無產階級，」大家走頭無路，然後把它武裝起來，做他的死力軍死黨，一鼓作氣的衝出來，便是他心中無上的辦法吧。但是這班死力軍沒有飯吃也是不行的，講唯物史觀沒飯給人吃，他又有什麼把握呢。我還可以回溯往事，來證明鮑羅庭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有點什麼能力，他的政策到底行不行。兄弟沒有甚麼軍事知識，但也曉得凡是兩軍對壘，都要講求個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主要的敵人，是個甚麼樣的人，本領如何，至少應該曉得的。如今鮑羅庭是我們主要的敵人了，所以我們對於他這個人，也不可以不曉得。他從前究竟做過些什麼事情呢。我們只聽見他到過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他驅逐掉

了，因為他想用共產黨來攪亂土耳其的國民黨，土耳其的國民黨很有力量，很能夠統一土耳其的華命，因而鮑羅庭和共產黨通通被趕跑了。這種情形，差不多和他日前在我國的情形一樣了。聽說最近鮑羅庭在漢口，同日本海軍當局商量說：『萬一我於必要時，借坐你們的兵船離開漢口，行不行呢？』據此可見他當日在土耳其的逃跑，現在又快在我國實現了。他對於我國的情形，有許多不懂，他以為我國一切的事，非靠幾個外國顧問不可；他的意見，往往和我們不同，他以為一定是他操勝算；但是結果下來，大都適得其反；每有甚麼重大的計畫，我們贊成而他反對的，那就一定成功；我們反對而他贊成的，如果照着他辦，那麼一不小心，就上了他的當了。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是如此。我想無論是同志，非同志，甚至於連鮑羅庭自己方面的人，都不能否認的吧。

試舉幾個重要的例子。我們開辦黃埔軍官學校的時候，總理正在廣東做大元帥，辦了三個多月以後，學生有兩班，便碰着當時最難解決的商團問題發生了。商團要推翻我們的政府，想歡迎陳炯明進省，又結合了省內滇桂軍的大部份，於是廣州本來沒有力量的商團，這時居然召集起全省的商團大會，成立了一個總商團；同時便有一個帝國主義的走狗陳廉伯出來，替他們買械；不意一大批槍

械給蔣介石同志查出來扣留了，他們便大起恐慌，嗾使同他們聯合一氣的滇桂軍出來，要求政府給還他們的槍械。這時候我們當然不能答應，商團便揚言政府將用工農自衛軍實行共產，所以沒收了商人自衛的槍械。其實當時廣州的工農自衛軍，完全是徒手的羣衆，不過這班人裏有些共產黨份子，到處拚命的煽惑，商團看見他們如此，所以才有上面這番話的，而一般商人和廣州的民衆，都有些相信。同時鮑羅庭還教共產黨亂發傳單，一定要引得廣州市民都怕起來，教廣州的市面通通墮入恐怖之中，換句話說，他存心只管是破壞我們的事。當時滇桂軍的領袖是楊劉，省長是廖仲愷同志。廖同志不願意幹了，一定要交給兄弟繼續幹去。兄弟覺得這事並非全無辦法的，這種商團，當然應該解散，但是絕非鮑羅庭的那樣辦法。兄弟便同 總理說：『總理如果相信兄弟去辦這事，唯一的條件，要總理不聽鮑羅庭的話。』 總理當時說：『我並不全聽他的話，同時也聽你的話。』兄弟又進一步要求 總理對於這事只聽我的話，絕對不聽鮑羅庭的話。 總理說：『爲什麼呢？』兄弟說：『總理的意見，以爲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也不妨採納他的主張，但是他在 總理旁邊，今天一個辦法，明天一個辦法，按實了還是一個辦法都沒有聽了他的話，一定要壞事的，所以要求 總理將這事完全聽兄弟』

去辦。」總理便說：「好。」那一天廖仲愷同志、譚組安同志都在坐上，聽見兄弟和總理兩人的話。其時各軍隊又都有一樣的要求，說商團藉口扣留了他們的槍械，所以振振有辭，或者政府將槍械發給他們一點，他們該沒有話講了。兄弟就同蔣介石同志、汪精衛同志、許汝為同志、商量省城的軍隊，既多數幫他們這樣說，或者可以給還一小部分，限定他即日開市，服從命令；如果還是違抗，我們馬把他們的罪惡完全宣布出來，我們教各軍明白他們的罪惡，全省城的民衆明白他們的罪惡，我們馬上可以解決他們的。當時我們只管商量解決商團的辦法，鮑羅庭却慌張得很，一面主張把黃埔軍官學校搬往韶關去，免得受商團的影響；又說：『要解決商團，各軍都不能用，只有叫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去衝鋒，各軍都希望商團發作起來，好乘機占領廣東，大本營的命令已不行了，糟得很了。』他好像要將黃埔學生來做犧牲品，造出種種胆小而且胡鬧的話來，搖惑別人的意志。幸而我們都不大理他，究竟照着兄弟和蔣汪同志的辦法，商團的罪惡，却於雙十節遊行的當兒，完全表現出來。於是軍隊和民衆都曉得商團是要作亂的了，從前和商團有多少接洽的滇桂軍將領，都覺悟過來，一致從政府的命令，討伐商團一夜之間，便完全解決。鮑羅庭後來見面，很覺得出乎他意料之外；我曾經安慰他道：

你是個信仰馬克斯主義的人，你不會將整個的對象，充分的分析了來下批判，並不是我們能幹，實在是因爲你是外國人，不懂情形。」

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鮑羅庭是一種甚麼人的。當我們要解決楊劉的時候，本來先已出兵東江。出兵東江的計畫，鮑羅庭在北京，沒有參加。我們決定以後，以黨軍爲主體，助以粵軍，合力進行。今天座中的陳銘樞同志，在這一役裏，也是很出力的。我們真正的兵力，祇及敵人十分之一，但是居然能把陳炯明的軍，各個的擊破，和現在的打吳佩孚和孫傳芳一樣；葉舉洪兆麟林虎，是一個一個被我們來打破。楊希閔等，是和林虎勾結，和北方勾結的。劉震寰，却和唐繼堯做一氣。林虎一敗，楊劉便起來想佔據省城，搗亂後方，換了大本營的旗幟，消滅東征的軍隊。兄弟曉得這時危機一髮，解決他們實在迫不容緩了，便找廖仲愷同志商量，同下決心。廖同志又到潮州方面去，和蔣同志，許同志，計畫約定，一切布置好了，動員命令也下了。鮑羅庭忽然從北京跑來，曉得了這件事，乘夜來見我，却一味的反對。當時翻譯傳話的是宋子文，從晚上九點鐘，一直爭論了幾個鐘頭，他總不以我們的辦法爲然。他說做革命的人，是要計劃成功的，不能如此冒險。兄弟說：「革命的人不冒險，還革甚麼命呢？」他說：「既然沒有十二

分的把握，冒險便錯了。」又說：「東江雖已打下，但還沒有肅清，何不再等幾個月，更有把握呢？這時候機會未熟，你們不敷衍他們，反而要解決他們，完全錯了。」兄弟對他說：「這是你不明白處，我們並不是全憑主觀，客觀上我們已研究得很清楚了，不是我們要解決楊劉，楊劉自己已走到非被解決不可的那條路去，所以為黨的立場，為革命的立場，以及為民衆的解放，都不能不辦；我們已經下了命令，已沒有商量餘地。」他說：「下了命令也是要收回的。」兄弟說：「收回麼，不但政府不肯如此造次反覆，究竟把我們的將士置之何地？」他辯了還要辯。兄弟便說：「我早晨三點鐘起身都可以，但是現在不能到兩點鐘還不睡，請你明天再來吧。」他當夜悻悻而去。第二天見面，他却對兄弟說：「你所講的話，通通對的，我盡我的能力來幫助就是。」但是他後來又和嘉倫鄭重地對我們說：「六月二號以前，絕不能與楊希閔等決裂，無論如何為難，保持以前的狀態，使軍事得圓滿進行，是政治當局的責任。」但一方面他又有意無意的破壞我們的計畫，洩露我們的秘密。他在他們的機關報上明白的說：「國民黨左派已決計打破楊劉了。」又說：「胡漢民是現在有地位的，汪精衛是向來講妥協的，聽說還天天到什麼地方和楊劉說話呢。」他當我們未曾舉動之前，先在報紙上發表這樣文字，明明是想破壞我

們的事情，而趁勢中傷我和精衛；這種反動派的陰謀，也太爲顯著了。幸得他這機關報嚮導，從上海出版，寄到廣東時，我們已將楊劉打破了，要壞我們的事，終歸無效。所以我們當時凡有甚麼事，若一經同鮑羅庭商量的，無論聽不聽他的話，十九都是要糟的。

最近更不用說了，他專心致意，唯一不二的目的，就是收拾國民黨，破壞中國國民革命。論他和我們爲難的本領，是最高明白，論他幫我們計畫甚麼，簡直是引我們墮入黑海。若聽他的話，我們此番北伐，不但到不了南京，連武漢也不得到。他和中國的共產份子，都反對北伐，尤其反對出兵長江，不止言論主張是如此。所有種種事實，我們武裝同志，現在都已明白，不用我說了，足夠看出他是個甚麼樣人。有些甚麼本領了。如今汪精衛，孫哲生等，還要相信這樣一個人，領教他這樣的本領；對於什麼辦法，都不研究個清楚，就是一句話道：『鮑先生是這樣說的；』遇著什麼事情都不自己想想方法解決，就是一句話道：『我們請教鮑先生去。』我真替武漢一班人可惜，也就太可憐了。我們呢，對於鮑羅庭等輩，既已看得很明白，當然不再受他們的欺騙，惟有實行剛才主席的話，把我們獨立奮鬥的精神提起來，把我們實行三民主義的精神提起來，於最短期間，完成我們 總理的遺志！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

一五八

## 農民問題研究

河西太一郎著 周亞屏譯

定價五角

本書共分三編，第一編，農業問題底基礎的考察，第二編，研究各家農業理論及農業政策，第三編，研究農民運動。著者對於許多問題和各家的主張，都經一番分析功夫而以事實來證明之，才下批評，可說很具科學的態度。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各國革命史略

邵元冲講演 定價三角

本書共分七次講演。于美國的革命，法國的大革命，德國的革命運動，俄國的革命及革命後之設建事業，以及現代各國革命之趨勢，如土耳其，印度，波斯，愛爾蘭，朝鮮，等都有講到。敘述簡潔，議論明晰，極便閱看。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孫中山先生遺著之一

## 中國存亡問題

定價三角

本書爲民國六年孫先生反對中國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而作，由朱執信先生執筆屬詞，而由朱執信先生出名出版。茲由胡漢民先生鑑定，認爲孫先生所著書，先印單行本，備將來列入孫先生全集。卷首有吳稚暉先生序文，卷末有胡漢民先生跋。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高爾基小說集

宋桂煌譯 定價六角

是集共有小說五篇。大都是描寫遊民、流氓、賊子、乞丐、貧農、勞工之生活。一、曾經爲人的動物，二、二十六男和一女，三、折爾卡士，四、我的旅伴，五、在木排上。均是從高氏最好的小說所選出。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中國獨立運動的基點

戴季陶先生著 定價一角

(一)因五卅事件告中國國民

(二)指導五卅事件國民運動的注意

點

(三)對英經濟絕交與中國的獨立運

動

(四)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

附增「對於商報記者之談話」

廣州民智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胡漢民

印刷者 上海福州路三十一號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號 民智書局

分售處 漢口 湖北路漢口十一號 武昌 省政府前 民智書局分店 杭州 豐安坊 廣州 永興北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 民智書局 九十五至九十一號

發 (一三三七)

573  
10-3-7

10-3-7

